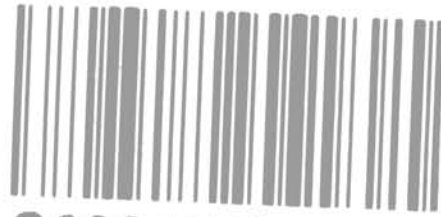


野中書齋

感覺的音響

秦似著



C0835516

德
禮

Feb. 27, 1943,

文獻出版社印行

野草叢書之三

感覺的音響

秦似著

文獻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

目錄

前記.....一

第一輯

野草.....一

道便是憎惡.....五

人語與鬼話.....〇

歲末紀事.....五

「砲火」及其他.....三

謠言三態.....五

看馬戲.....九

祭鬼和招魂.....三

隨談兩則.....五

談時間……………三五

也談遊藝……………三六

斬棘錄五則……………三八

作品與時代……………三八

「把船頭拉轉」……………三九

策士的面目……………四〇

英文……………四一

「偉大的捕風」……………四二

第一輯

「女性應該安于生物的平等」論……………四五

女子能力不及男子論……………五一

「挽狂瀾于既倒」……………五六

女子、聖人、革命……………五九

男女與職業……………六三

第三輯

作家二例……………六七

談文化界的「紊亂」……………七二

「作家慾」或一說……………七六

文學。批評。通俗等等……………七九

文學的用處……………七九

一個例子……………八〇

鞅和避忌……………八一

「通俗民族文藝」兩種……………八二

第四輯

張獻李闖……………八五

談黃花節……………八八

火……………九三

末世紀的悲哀……………九七

掩飾與自欺……………一〇二

前記

這兩年來，寫過不少短文，經挑選後，存三十二篇，印成小小的一集，因為藝術性較少，為避免「作家慾」之惡名，就直率叫「感覺的音響」。蓋亦寓意于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奴隸是有感覺的工具」也。

這些文章，常常只觸及一人一時一事，屬於日常報紙記事無疑。依「永生」派藝術家兼教授沈從文先生的說法，該叫做「小政客的叫猴兒戲」的；但我還是把它印了出來，這並非沈教授所指的「用捧場湊趣方式來討主子歡心」的目的，而是一方面爲了這些短文章，是用各種筆名，陸續發表在幾個報副刊和一個小刊物上的，看見的人不多；另一方面爲了與其等待拜讀那遙遙無期的「永生」的作品之後，再擴大經驗，從事「人類最艱苦偉大的工作」，真是人生幾何，未必比目前的飽食衣暖更少一點貪心與幻想。自然，這些淺薄的討好的東西，也許會減低了幾個讀者欣賞未來作品的興趣，也許連「說教的能力」也沒有，但我想，至少，我還不至於勸別人做夢。這就是和沈從文教授的主張不同之處。沈教授在「小說作者和讀者」上面，主張小說內容應該包含兩部份，一是

社會現象，即人與人之關係；二是夢的現象，即人的意識或意識的影響活動。而且「經驗和夢想所組成的世界，就代表人間。」

然而「力的政治」「三次主義」「主人的道德」不是在「求生」「夢境」的底下擺出來的嗎？所以教授們並不真在做夢。說穿了，也算得一場小政客的醜態見解的。不過他們比較高深，隱晦，只「需要少數解味的看客」而已。

其實，「力的政治」是以血液作墨水，地面當紙張的巨著；教授們談起來，恐怕還多少有點隔膜，連少數解味的讀者也不易找着的吧。希特拉是也用文字的，寫過一本「我的奮鬥」，但只能有一本；正好像謨罕默得的可蘭經。「什麼文化」！聽說戰國策停刊，也是資為證。

所以，我在這樣的時候印這本書，縱然是「庸俗分子的抬頭」，還並非格殺「藝術的水平」的兇手；不過我的藝術力量的薄弱，使我感到更需要努力學習，這是應向教授之外的讀者們告白的。

一九四一，四，十八。

第

一

輯

野 草 (野草月刊發刊語)

I·魯波爾在他論及高爾基的一篇短文裏面，對自從十八世紀新的一生活主人上台之後的文學，作着這樣的說明：「在文學裏，產生了人的變形，有一種人的臉變成『資本主義的獸臉』，另一種的臉在苦難中變得畸形了。」

這也真說着了一些文明國家的進步作者。賽珍珠比喻中國的抗戰作禽獸放蕩巢穴而避免危難於先，佛烈達渥地利比喻蘇聯之國家「佔有」土地與德意志之國家「統治」土地為一邱之貉於後，而木戶幸一更早在「中國事變」後不到一年，便苦心孤詣地證明了大和民族的文學最初而且最精彩的是所謂「國風」，即和歌，開頭一篇就是「宮庭篇」。

。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又正在苦難中掙扎的中國，其文學本質正如政治本質一樣，是遠離着這樣文明國家的。我們的抗日現實主義作家，在他們的主題與形象裏面都創造了「人」，歌唱了「人」，改變着「大羣苦難者的「畸形」的相貌，要使他們從俯伏着的奴隸地位站起來。無論成如就何，已經在這道路上行進，總是的確的。

然而我們雖然自稱善於憧憬光明，却同時也善於忘懷災難。辭綏和敵佔區正在一槍

一羣捧捧敵人，在各方備有人窮奢極樂，在醫院裏，在酒席上餽子，運私貨發大財，口裏說的是抗戰建國，心裏想的甚至手裏做的却可以是抗戰建家。（這裏的抗作動詞，戰作名詞解）。這些人只感興緻於「叫我如何不想她」或「山在虚无飄渺間」之類的「女體舞奏，文學當然是多餘的。如果也看看，那就正是把濃臉塗上化妝粉，使奴隸戴了隱身符或者塗白了墨子的一類。爲了這些傑出的人們，和他們公子哥兒，幫閒們和幫忙們的興趣，這一類讀物真是鴻運高升，方興未艾；而由其數之多，裝幀之美，自視之高，又足徵有錢且有閒的欣賞者層正在方興未艾。愛倫堡曾將這類精於鑑賞者們比喻作精於食事的食客，他們愛好的是一盤腐臭的野雞。林語堂先生最近又在「生活的享受」上面給我們指點，中國人的精美食譜，同時就是良藥。他還給我們考證出來，中國人素來對於病都是「先以食療，不瘥，然後給藥」的。所以即使同是野雞吧，於外國那些傑出的英雄們不過貪奇嗜野，而於中國的這些們則還有養身息生的功效——「劑極度溫和的鎮靜劑」。

在這樣的時勢下面，我們却辦了小小的「野草」。

命名「野草」，用意所在，並非全然因襲，也說明着我們對這樣一個小小的東西，並不高瞻遠矚，自己先給他一個卑之無甚高論的名號。野草雖然孕育於殘冬，但茁長和

拓殖却必須在春天的。如果嚴冬再來，牠自然還待消亡。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固然說明着草莽之類的頑強，然而也同時是自然界的機械循環的悲劇。這種機械的循環，於人類倒不能類推的。大抵人間的春天到來，嚴冬自己就必先宣告死滅。不過這正是野草身外的事。在目前牠只是蕪雜叢生，荆莽交錯，既無花果之望，亦無枝葉之陰，並非大樹，因之也沒有什麼什麼風了，不能供若干者們的乘涼，是顯然的。牠只希望給受傷的戰鬥者以一個歇息的處所，讓他們退到野草裏，拭乾傷口的血痕，再躺一會。如果因疲勞而至於飢餓，則掘幾把草菇，也聊勝於無。雖然沒有維他命，更不能同時做藥；倒是可以恢復一些元氣，再作戰鬥的。至於原本就很康健的人們，自然也可以到這原野上呼吸一些蒼葱的氣息。呼吸固不如吃大菜同時吃下良藥一樣方便和簡單，牠既不甘香，也還須用力，但若果肺部不健全，却正需要一些野氣息，餐必肥甘補品，仍不足以保證深在內臟的潰爛面不擴大起來的。

這裏不是鋒鏑所在，不是作戰的前綫，然而却劃了一道「人」與「獸」的分界。如

果畸形的受難者們正立起來的時候，獸臉就將被刷清或者自己藏起來。

我們知道，今年七月十二日便是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將決定民國的前途和國民的命運，而在這之前，大不列顛帝國限日本於十月十八日以前結束中國事變！弄

一點筆墨，比起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槍口，用生命去爭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批青年，正如倍·柯根所說，是「以花邊去比喻槍砲了」。然而「英倫的霧」以至「美國人的狗」一類東西正大量地在印，這事實又教育了我們，即使同是花邊，也還有硬軟好壞的分別，有的只準備給太太們做裙帶，有的却可以替戰旗做鑲嵌。如以上面所說的種種，就印了「野草」。

一九四〇，七月

這便是憎惡……

報載，上月二十八日，上海霞飛路上，發見了「鈔票滿天飛」的奇蹟。據說是一位不知名的外人，從某大廈的屋頂上，向街道中一張張拋散十元紙幣，以觀賞途人爭拾爲樂。而新聞記者加按語曰：「在生活程度劇漲的今日，這位外國人可謂是少有的慷慨，給現社會一個很大的諷刺的了」。

究竟這些「爭拾」的「途人」是些什麼人，不經眼見，很難確定的。而因此就推測必然是生活困難的下等人，未免也屬臆斷。箠食壺漿，弗得則死，呼爾與之猶不受；何況居高臨下，大散金錢，其凌人之氣更豈止於「呼爾」。但對於慣於做夢的人，這才是白天裏的一場歡喜夢，照推測，必然爭先去搶拾的，這之中也許有窮苦的下等人，但更多的原是原來就希圖着不勞而獲，仰人寄生的市儈和有閒者。緣因大抵如此，與人之上下是無關的。因此散鈔票的人觀賞的也只是——一個個翹高屁股，喘着大氣的癩三、落魄文人之類的滿臉倜儻相，樂，是未之有的，新聞記者按語說這位外人有神經病，大概屬實，否則在上海這地方，化幾毛錢就可以看少女的大腿，要上算得多了。

在現在的社會，許多人窮奢極侈，更多的人則生活在他們的奢侈或貧窮之中。這是不特外人，中國人也是，不特洋場，僻壤的農村也是如此的。都市裏面叫舞女，姨太太，在農村中就叫「小家碧玉」；洋場上洋人和買辦所享受的，在農村裏不過變為純樸些，原始些罷了。被奴役的或尋樂的對象，窮人和女人，做了奴隸。另一方面，有一班人則為享樂者所象養，這是奴才。歷來的奴才，望着上面賜下的小恩小惠，大多是得意忘形的，自然由上面來的也有虐待與侮辱，但他們又很善於把所受到的壓抑，轉嫁在自己底下的奴隸身上，便覺得非常的輕鬆了，歸根結底，還是下等人倒楣。天下間如果沒有奴隸，奴才不但做不成，而且也不會像目前的愜意的。有外國人在樓上散鈔票，於是乎恭維這是少有的慷慨，並斷定是給現社會一個很大的「諷刺」的了，這正是奴才的面目。

龔自珍出使到蒙古時，心花大放，在一說居庸關上得意洋洋寫道：「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趙，安得與反羣者相搗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慣於奴才的生活，一旦吸着一些自由空氣，還不忘打躬作揖，感謝主子。其妄天樂命一至於此。我曾看過一張以美國南北戰爭為題材的影片，裏面描寫白人不讓黑人持有武器，而那個高大的黑人酋長就首先把武器繳去。因為即使投降，也仍然管轄着黑人，他的地位是不至於變更的。不久之前，達拉第提倡改善法國工人生活，而據宇宙風

工人和並不滿足於「改善」的工人存在着在法國，因此使法國的奴隸分化。這就說明丁德意志人還在巴黎之外，法蘭西上等入便宣布巴黎爲不設防城市，終於屈辱媾和，在殘山剩水之間，施威行令，而爲什麼下等人還能承受這雙重的壓榨和枷鎖。——如果沒有對達拉第的「改善」表示熱心的人們，是不能達到這一步的。

奴才就是這樣地不斷作用於奴隸，影響奴隸；做牛馬的年代已久，回復到感覺自己的「人」的身份，本來是一個曲折的困難的過程。而加以奴才們多方面的誘惑，誑騙，就漸漸覺得壓榨和迫害也是合理，小恩惠也是難得的了。直到現在，儲蓄彩票和文學獎金不是還在使許多窮人強烈地興奮着麼？這就是我們還不敢斷定霞飛上爭拾鈔票的沒有下等人在內的緣故。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俄國也不免這樣。高爾基寫這一種農民：「當地主偶而稱贊農奴爲英雄的時候，農奴因此就用諛言醜態來奉承地主，欽佩他們的智慧，辯護他們的殘酷，默認他們的權柄爲合法」。他們希望着一些生活上的改善，改革，而把希望寄託在幻想上，或者用盡畢生勞力在「上進」的路上爬，——這也就是產生奴才的道路。爬上去了的，那是奴才，他會說他的知識才能都勝過那些爬不上，還被壓在更下面的。但爬不上的倒是最大多數，因爲生產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正像一座千人塔，必

額下面有許多被騎的人，上面的人才不會掉下來。

這個祕密是不能讓下等人懂得的，否則他們就會不再相信宿命，不希冀恩惠，而感到自己是最後的受害者，起來反對偽善，揭開欺騙的外衣。也正因為他們是最後的受害者，找不到替身，因而從他們發出的要求，往往最澈底和最深刻。為預防計，所以古今中外的專制統治者和奴才都恪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老法子：聖君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民」，就是這樣意思。人民愚頑無知，渾渾沌沌之後，對於「慷慨」的布施只知感謝，而無所知覺於麻醉及詐欺，也無所反抗於榨取和迫害了。

不幸的是，愚民政策雖然製造了不少的文章，却沒有征服民心。從有等級的社會開始起，下等人就有了他們的心聲。「風，下之所以刺上也。」三百五篇「詩」，竟有不少出於民間的徒歌。而「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秦始皇可以焚毀許多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心聲却無法格殺。到了朱熹加註，才都變成「淫婦謠子，淫奔期會之詞」。可見奴才鉗口征心的成績，有過於統治者的。然而即使這位士大夫竭力冲淡、洗滅有等級的社會的不平，這不平還是在事實上表現它自己，而最下等的人們，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人民要站起來，首先要擺脫奴才們的影響。消滅對於小恩惠的憧憬，代替以堅決的

，澈底的一人」的自覺與自尊。年代的前進，使奴主與奴才的惡態日益表露，被迫害者的反抗之聲日益高亢，雙方的營壘，在今日已完全改觀了。

假使我們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人民的站起，民主政治的實現。而疾視那些躲藏在侵略者迫害者的牆壘下面，只欣幸於一片麵包一根骨頭墜下來的奴才，這便是憎惡……

一九四〇，七，六日

人語與鬼話

如果世界一切作爲人的語言都湮息下去，只剩了鬼話，是很荒涼的。可幸這種情形倒不會有過。古希臘的諷刺作家琉善（Lucian 一二〇——一八〇）曾寫過三十章鬼話，但即使在他的作品完全黑暗了的背景里，也還有代表「人語」的一種鬼的意見在。譬如第十章上面就有着這樣一段對話：

暴君（鬼）：我是某國的暴君。

黑梅斯（鬼）：到了這里，要這許多好看東西作什麼？

暴：怎麼呀，你要暴君脫得乾乾淨淨才到這裏來麼？

黑：一位暴君麼！你當暴君的時候，我們原不敢這樣煩你。但是你這時候是一個鬼，我們却對不起了。請你都脫下來！

暴：我都脫下來了，富貴都完了。

黑：你還有架子，還有驕傲，也都要去了。

暴：你至少也讓我留住我的紫袍王冕。

黑：不能，不能，都剝下來！

這已是第二世紀的作品，如果是出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什麼作家的手筆的話，這段話是在刪除之列的。雖然所談的不過是鬼世界。

近在手邊就有一個例。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在末亡的法蘭西的一個法庭上，有幾個人據說是犯「叛國罪」，推出來審判了，法官首先問什麼職業，一個囚犯回道：「議員」。

法官：「你不是一個議員」。

囚犯：「對，議員的權利已經被剝奪了。」

另一個囚犯：「必須達拉第到場，他指我們是賣國賊，然而賣國賊恰恰不是我們，是那些出賣奧大利，捷克和西班牙共和國，並鼓勵希特勒侵略的人。」

在羣衆的騷動中，警衛隊的拉雷阿提上校憤憤地咆哮起來：「我不准別人說政府是在竭力破壞和平。」

另一個聲音爆裂了，是被告的辯護律師哲瓦士對法官的提示：「人和禽獸的分別，就在於他有言語的力量。」

這里所提示的「言語的力量」，是用「人」的資格來抗議迫害的尖銳表示。要用人

語擊退專橫，是顯然的。

然而這到底已經是三個月的事，時勢演變得真快，又三個月之後，「巴士底獄」以來，共和了一百五十年的法蘭西這才真的被賣掉了。誰賣的，似乎還是警察。因為在我們這邊，另一個共和國的自由人們，又正大發其議論：說是法國之亡，實由於什麼之類，的怠工或反戰等等。所以這些人們一面在哀悼花都麗國的顛覆，一面也就着重於現身說法的衛道：或則如陳孝威「將軍」在介紹福煦元帥的名著中鄭重聲稱：「法國當時之國民戰爭，與吾人今日之全民抗戰，同其裔本」，或則如某名教授娓娓動聽地輕描淡繪一下：「法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一切都成功，為別國所羨慕。」「其實那裏止呢？實際情形還要比表面好百分之二十。」若夫直截了當的爽快話，只有一句：「所以民主終底要亡了國！」

定論還在混沌中，沒有得出來。不過這時候常常浮起一兩句人語，為那些盪沙般的蟻民鳴冤，但同時也有勝者的嘲笑：通訊社傳出的消息，巴黎人民一再凋萎，面如菜艾了。戈培爾提取精義，得了很好的播講資料：「法國人在血統上及精神上都含有很重的黑人分量，現在已充分的表現在外」。這同時又成了我們這邊的黃色人種的笑料。敗亡者之於我們，是有定諡的，曰「賊」，如果不是一時可以勦清，則冠以「流」，至若笑

落以膚色的幾種的，還發覺這次最早。可見雖然自稱「本裔」，就文明程度說，却是不自量的笨蛋。

但奚落的對象仍然是有珍域的。被嘲者是蟲沙的小民；一般如猿鶴的君子呢，自然還做穩可以飛也可以走的白種。所以當戈培爾正在巴黎的國立圖書館大閱案檔的時候，維琪的賴伐爾却可以爲着防範佔領區里的「游民」的叛亂，向德國請援。這事實，使人鬼弄個分明，各各負着應負的責任，同時證明了這邊的自以爲正人君子的匡時之論也者，其實也是鬼話。雖然穿起袈裟，儼然救主，實則連毛孔也滿藏毒箭，自己還沒有站起來，已經對着那些在迫害者的凌遲之際而尙未氣絕的人們射過去了。

自然沒有射死；於是再來唾啦一番。這次是說法國人只會弄文學和藝術，自由而又浪漫，當然只好亡國了，要救國惟有高度的「集中化」。又名「戰時體制化」。然而其實這與事實又是不符的。不特遠在去年八月達拉第便禁止了由巴比塞創辦，作爲國際作家協會法國支部的會報「和平與自由」，而且連有名的龔古爾文學獎金，法蘭西學院獎金等等，也由於文學作品的缺乏而考慮停止審評了；馳名的「精神」周報改了月刊，篇幅還得出三百頁縮裁爲三十頁；報紙的文藝副刊則是明令取消的。一種以介紹新書爲主的雜誌，自動停刊，因爲文壇乾淨到幾乎一本新書都沒有，無從評起。有骨氣的出版家

傳到這下，幕下的燈亮起招牌：「歐戰時期要求特別飄逸和靈敏的文學，描寫靈敏陰暗的
女人或苦寂寞的男人的一。這些招牌甚至掛到兵營里面。然而就是這一類作品，也沒有
靈敏的作家不是逃亡和下獄，便是當書記或者兵營的辦事員去了。」

在這種情形下，是喚不出自由的氣味的，同時也正便利於東方西方獵狗們的猜測。
坐在這小朝廷里面的官紳，享着資本主義最末的火爐的餘炎，用這火爐，由別人的手
焚毀了第三共和國，又由官紳們自己的手，火葬了和火葬着鋒鏑之下的流浪民，逼使他
們沒入海洋，進入地窖，然後再擺出悠然自得的架子，在完全黑暗了的地獄中，坐上完
全黑暗的寶殿。

然而這却是每况愈下，困頓而猶以為有餘地的處境。人語是被抑殺了，但魑魍的噪
噪也不見得能夠傳開去。看日益逼近眉睫的事實，却是無聲的巨響在震撼着這烽火之邦
，那便是黑梅斯的一句老話：「都剝下來！」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

歲末紀事

年年歲暮，多遇陰雨。明日新年恐怕還不能光天化日吧。果然，入夜雨就大起來了，既不出門，就翻翻報紙，想尋找材料，作點「爆竹一聲除舊」之類的文章。

一九四〇年是驚濤駭浪的一年，除六分一土地外，全世界遍燃着災難的火。關於中國反侵略戰爭的不想談了。明天報上一定有許多同樣的反覆的紀述，或者感想，意思大概總是結束了悲苦的暗夜，踏上「勝利年」或「進歩年」了等等。我的意思也「差不多」，所以不如節約紙筆吧。剩下來可記的，就是一年來的世界。

一年來世界的可記之處，用最簡單的話說，是殺人殺得多。德軍攻入巴黎，據說「比上次犧牲爲少」了，因爲先插了白旗的緣故。像六月間敦刻爾克港撤退的八十萬帝國兵士，就不能這樣安然，而是在空海夾攻之際，背水戰沒有打成，大部分沒入海里淹了的。到十二月，失利的是軸心了，仍照樣是殺，砲轟，空炸，北非洲的八師黑衫軍就是這樣「消滅」了的。退到大塊沙漠的巴第亞，是殺，追擊，殺，逃入「不見天日，惟有野狼躑躅雪中」的亞爾巴尼亞山谷，也還是殺，追擊，殺……希特拉和慕梭里尼固然

是混世魔王，其他滿口正義人道的權威者也未必見得就是存心救世的善良人種。

但一臨歲末；作小結帳的時候，大家又忽然講起良心來了。希特拉向兵工廠工人演說，「德國勝利即係資本家失敗」，過於矯言，大家不會相信，但他的向英國建議聖誕休戰三日，互不轟炸，據說就是「對美國人民的人道觀點所贈的禮物」。英皇的聖誕廣播更充滿仁愛的字樣，節錄起來，就是——

英國今日所遭遇之危險與艱難，可以自力克服之，將來和平恢復之後，世界必變為生活較佳之地，目前吾人皆處於前綫之上，全國各地人民所表現之堅忍剛毅與患難相共之精神，實極堪欽佩，值此聖誕佳日，因受戰禍而致骨肉分離者不知凡幾，且有多少兒童遠適異鄉，余在此特致安慰之情，愿彼等明年快樂。

維琪政府怎樣呢？——

（維琪二十四日電）本日乃聖誕節前夕，貝當元首特向全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其言有曰，今夜吾人當慶祝聖誕節，但今年之聖誕節頗為悽涼，緣有多數家庭正感骨肉分離之痛，回憶去歲今日，征人猶能請假返家，與其家屬同度佳節，今則強半已不知去向，殊可扼腕，職是之故，吾人今宵慶祝聖誕之際，

務應首先念及爲國家光榮而犧牲之烈士，以及迄今猶被囚禁於異域之戰爭俘虜，以後者言，彼輩今夕身處集中營內，或爭能參加彌撒，或啓視其家中寄去之包裹，彼輩雖隔囚異域，與吾人遠隔雲旆，但吾人常未忘懷之，此外尙有大批人民，將不知聖誕大菜爲何物，甚或不知明日能否得食，聖誕夫人更不必爲其子女攜來任何玩具，各地難民所寄居之荒村中，甚或不聞教堂鐘聲，蓋以全國救濟協會所不及加以救濟之貧民，與失業工人，爲數尙多，吾人每一念及，能不爲之黯然，惟有一事吾人所不忘懷者，卽聖誕節實乃救主之誕辰，亦卽人類獲有希望之一日，茲者新法蘭西已在諸君痛苦與犧牲中誕生。

二十九日的路透電則預告羅斯福將發表「爐旁閒話」。但「其性質如何，外界迄未獲悉」。還是先看戴高樂的談話罷。

法蘭西民族委員會領袖戴高樂，向淪陷區與自由區全體法國人民發表談話，令彼等在明年元旦羣留室內，關門閉戶一小時，表示對被征服之法國作一種無言的抗議，其時街道上將僅有敵人出現，吾全體法人，於此時可默思吾等如何可獲得自由解放，則此短短一小時，將充滿無限之希望，然而各種舉動，必須堅定謹慎爲之，此種無言的抗議，可代替公開之示威運動云云。

這回是不必明年，只消三日，事情便證明了一切同情，慰安和惋惜都是多餘的了，

看罷

使大家在無可如何中，破顏一笑的。

但今年耶誕誕地黑暗無光的「徵兆」，實在已經預告着「聖誕節乃教主之誕

聖誕夫人更不必爲其子女攜來玩具；他是不作豪語的，只有「雖然」

「因此預約裏面就掩藏着一半虛空。貝當說得幾乎聲淚俱下：教堂的

「只是悽涼點綴吧了。得發表談話術之三昧的，要

「讓街道上僅有敵人出現，算是無言抵抗」說，不獨可行，而且也的確

空前大轟炸

倫敦金融區落彈數千

英機襲義紙彈鐵彈齊飛

【中央社倫敦二十日合衆電】軸心國空軍今日在倫敦區域，投彈數千枚，此爲空前未有之「大火轟炸」，某區一地即中燃燒彈兩百枚。

【中央社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據此間已證實之消息，昨夜皇

家空軍飛義大利那不勒斯投擲炸彈，轟炸至烈……

「海軍部」也發表了，內容是，反對發動和平運動，應達成一民主國家
「海軍部」也發表了。而且還有有關中國的一節：

羅氏又稱，彼認為中國對日之戰爭，為民主國家對全圖征服世界之惡勢力
作之一部份，此點亦頗堪重視云。

雖稱「一部份」，倒是含有深意的，中國的反響如何，報上還沒有評論，只好剪貼一
九三九年六月廿九日信先生在戰國策上發表的意見，以供參考：

爲了這個原故，有些眼光遠大的人在去年即主張我們拋棄中立，實行參戰
。主張參加英法的，根本上以爲英法握有制海權（Sea Power），最後勝利必
屬於她們，與彼等爲盟友，可利用將來解決世界問題的機會順手解決中日之間
題。反對這主張的，以爲（一）我們參加英法，英法未必歡迎；（二）縱使歡
迎，我們無法派兵赴歐（中國無海軍海船，同時日海軍不能如上次歐戰一樣
九，可登陸也下皆勝），（三）英法未必能得最後勝利。

於是有些人主張參加德義。這可分兩派；第一派爲汪系漢奸前在參政會大放厥詞的，這派本無甚主張，可置而不論。另一派並非漢奸，而真誠的相信最後勝利屬於德義，主張參加她們的理由，如主張參加英法的一樣，希望最後勝利者同享美果。但問題亦如主張參加英法一樣；（一）爲德意是否歡迎？（二）爲如何派兵赴歐？（三）爲德意是否能得最後勝利？還有第（四）德意缺乏制海權，能助我的甚少。

無論是參加英法或參加德意，這一步在中國內政上將發生最嚴重最深刻的影響。參加英法之舉必引起×××軍所代表之勢力的不良反感，也許會召至統一陣綫之分裂；參加德意亦然。在抗戰期間，當然是團結第一，統一至上，以暫守中立來維持國家的統一：這是政府的苦心。

但上面不是說過嗎？長久中立不但難能而且不智。那麼，難道中國就永久在這不應中立而又不得不中立的矛盾中掙扎嗎？

（歐戰與中國）

亞里士多德說得好：「工具是沒有感覺的奴隸，奴隸是有感覺的工具」。帝國主義的爭霸戰已經把他們國內許多工資勞動的奴隸驅上戰場，而且變成蟲沙了，這些工具的

代價是什麼？幾句冷冷的同情與惋惜。常常聽說中國是半殖民地或半封建，但對於這話，不可知；假使枷鎖還沒有掙脫而終於因為「長久中立不但難能而且不智」而「實行參戰」呢，則那代價是冷冷的同情與惋惜也得不到的，因為這奴隸是雙重的緣故。

在民國三十年的前夜，光明還沒有完全到來的此刻，我拉雜剪貼、記述了以上的幾頁。非「任事不做的有閒階級」的勾當也，乃有感於歲忽忽兮而猶盡，也記下一點，作為送掉不很愉快的舊歲月，並囑來茲，而已，而已。

一九四〇年除夕

「砲火」及其他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巴比塞寫成功他的「砲火」。正如他在一九一六年十月的戰地家書裏面所興奮地敘述的一樣，這一部書曾經教育了當時參加一人類用着他們的血和肉去拼鬥部力量自己碎裂自己」的戰爭的兵士們。

作爲一個反戰作家的巴比塞，就熱憎戰爭的災難之火。用他的文字暴露了從前戰爭的結束牠。巴比塞所注意而人們所忽略的是如何避免新的爭鬥的再來，他說如果不改變當時的民族觀念，新的爭鬥是一定要再來的。因此他自己告白的說明，他的「砲火」不僅用着眼睛來爲同時代的野蠻和愚蠢哭泣，而是要爲杜絕將來新的屠殺和爭鬥而盡更多的力。

但巴比塞和「砲火」的成功都不曾遏止了這一次新的屠殺。這位最有力的非戰作家死後不過五年，法蘭西又再次躍入戰爭的火焰中。這一場自命代表民主的與代表神的意志的的搏鬥，爭奪的仍是地獄，不是天堂，無論勝利屬於誰，地獄仍然一樣漆黑的。更甚的是，在這一次屠殺中間，我們聽到的法蘭西靈魂的呼聲僅是屬於布洛克早已指出過的

「一種極其的、有價值的經驗」——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看見了革命和反革命，看見了第雷諾輩的波落戶式的豪語，見當內閣的自斃和欺人，「社會黨」的無能和墮落，它雖是少數，但支配了也似乎（僅是似乎）代表了現在的法蘭西。另一部分（大部分）屬於真正的法蘭西靈魂的呼聲——它在左拉對德雷福案件所發的巨響「我控訴……」上。巴比塞、羅曼羅蘭對上次大戰中的屠殺和暴力底熱烈憎恨上，紀德對一切偽善的不安騷上，巴黎公社時代勞動羣衆的澈底和率直的革命性上都曾經表現過——我們卻不能在這一次戰爭中聽見，「濫用權勢的階級」把它強姦，也同時抑殺了。

愛倫堡在七年前非常沉緬而嚴肅地論及過這兩種靈魂——法蘭西社會所表現出的最大懸殊和最深的矛盾——。在巴黎是威士忌（愛爾蘭種的優等獵狗）可以吃到比人更好的飯，娛樂者只化一個半佛朗就可以樓抱女人的。政治場上的上流人物，則始終懷着「精神的滿足」，無所憂慮也無所認真。這就是爲什麼土耳其人已經到了君士但丁堡城下，那兒的紳士却還在睡着，他們祇會爲着猜度那可以跑出錦標的車子而興奮。這就是他勾畫下來的無恥的一面的臉譜。

在這一次「民主主義對法西主義」的爭鬥裏面，法蘭西荒淫無恥底一面作了最完全的總的暴露。但這一個階級雖不足以言抵抗暴敵，鎮壓國內却是綽綽有餘的。在這一次

新的屠殺中，極力把法蘭西人真正的靈魂解除下來或者緩和下來，不讓它在罪惡的和恥辱的肇事或失敗之中作任何控訴和聲辯。當法蘭西已經失敗，它的敵人德意志已經獲勝的今天，濫用權勢的階級還自豪於他們的業績，是的，他們沒有敗亡也沒有死難，這準備着在殘山剩水間，向這敗亡死難之餘的人羣施威行令，德意志人迫近巴黎，他們就宣告巴黎爲不設防城市，因爲花的巴黎和凡爾賽一日存在，他們就一日可以豪奢窮慾，樂而忘憂。

然而地獄越加漆黑和紛亂，就越象徵了天堂的富麗和安謐。災難嚴重的法蘭西，是會使法蘭西底真正靈魂走向天堂的道路更接近了一步的，愛倫堡說過：「直綫可以變成螺旋，而最近的路也許就是羊腸小道。」

一九四〇，六，二十六日。

謠言三態

照很多人的說法，謠言是無根的，所以飄來飄去，可以升堂入室，也可以越海渡洋。但我以為謠言之起並非沒有，小焉者流言蜚語，大焉者風雨欲來，莫不都有出處可尋；不過有些謠言，也的確流傳得快，闕然息滅也快，曇花一現之後，根源隨之湮沒。至若始而傳，繼而闢，終而證實者，其根便耿耿然為世人所共見了。

不久之前，盛傳張資平赴滬附逆，但隨又有人說：這是謠言。張逆自己也發表聲明，他在上海專心讀書，編一個純學術的科學雜誌，而且閉門謝客，以冀杜絕謠言。並說，別人造謠的目的，在於利用他的聲譽替敵人拉人。曾幾何時，張正式附逆的消息證實，所編科學雜誌據說就是與主子合辦的。這時候恰好有從水裏爬起來的人說明真相，張初所以指說他附逆的話為謠言者，原是因這樣才便於拉人下水的緣故。替敵人拉人的不是一別人，正是闢謠的張資平自己。

據「文壇新聞」的報導，第三種人杜衡先生一向「並未與漢奸發生關係」，現在已任香港國民日報的副刊編輯，「真相大白」，而「從此『第三種人』為漢奸之謠可以休矣」。

了（參看中央日報六月五日，教育與文化）；假若刊出來的社衛先生的自白，也並不否認曾在汪機關做事，只諉爲「抽籤似的抽到了的」，既抽過這樣一條籤，則別人所說，大概有幾分可信，將來再來忠君愛國，那就還得讓人家拭目以待，要是仍又是一抽籤似的「鬼混一下，我看「大爲失望」的不只「尾巴們」，倒會更大有其人在的了。

可見也有人以真話爲謠言，藉闢謠以隱身，化身，陞官的。

但世間儘管是這樣，真正的謠言並非沒有，而且是很的。造謠者又常常是那些善於闢「謠」的醜類。真相揭穿之後，他們並不就自愧，無地自容，「名者爵祿之謂也」，唾罵由你唾罵，只要還有官位，還有趾舞纒頭的資歷，就仍可以堂堂然不在乎於什麼失節的。「爲的是吃飯呀，生活總要使人這樣。」然而對於正義方面加以的指責，他們也反辯，拿什麼東西反辯呢？造謠。吟臭穢的詩人到處發信，說他不是做漢奸，是反×。會做復旦大學教育系主任的錢慰宗，做了偽高等教育局局長之後，大發其「告復旦大學教育系同學」的宣言，內容對蔣委員長侮辱得無微不至——這是真正的謠言。但很少有效，因爲造謠的是敵人，是蹲在日寇袴下伸出頭來說話的，所以一看便分明，無足徵信了。

真正能夠爲害的謠言，是不但有人傳，有人信，而且還有人以不信的面目來「指責

「，而實際上於此道諸君。國人主觀。汪精衛人等。說汪逆政府不夠資格講和，要「曲達」，要「和平」，那麼大家再想法子罷。雖然在上海日本人發行的雜誌已經謹問道：「汪氏的中央，將來倘若經過若干時日，尚在無效衰微的中國能舉像『滿洲國政府』那樣的治績，則他們（指汪的背叛者）將怎樣說話？」但其實，他又何嘗至於將來不能說話的地步？口口聲聲的「汪集團」，「汪系」，便是將來說話的張本。

「不過和平謠言因此而使一部份絕望於抗戰，亦絕望於汪逆的人動心，却是事實的。也是這一態的謠言。據星島日報載，四屆國民參政會之後，上海各界發起了「憲政促進會」以徵求市民簽名並討論「五五」憲章，這一方面是在推進孤島的憲政運動，同時也是打擊汪逆的偽憲政的。之後，報上發表一則新聞。大標題是「某方又一騙局」。

「大光社云：本埠消息，汪精衛近以實施憲政為號召，藉以欺騙民衆，並拉攏各黨各派之政客，響應其所謂「和平建國運動」，最近利用灰色附逆分子，以署名所謂「憲政促進會」等，任意散發傳單，意圖根本推翻民二十六年「五五」憲章，及重選國民代表，以遂其包辦淪陷區域之企圖，並發起「簽名運動」，向各界請求聯署，竊取民意，以動搖對中央之信念。現滬上各界合法團體，均洞悉此種行爲，

顯係欺騙民衆，擾亂國本之舉，一致予以拒絕，足見黔驢之技已窮，此項新離局，又告失敗云。」

義正詞嚴，冠冕堂皇之極。可惜據是島日報特約記者按，大光社者，就是不久之前受汪收買的通訊社之一。「竊取民意」「搗亂國本」云云，是指桑罵槐，表面罵汪，實則所指猶的「簽名運動」汪派無之，而滬上各界正義人士則正在進行。

這道自然也是撒了一個謊，謠言。但這是賊呼捉賊的詭術，真能使若干人分不出官兵和竊匪。他是化作小生的丑腳，走進後花園來和小姐相會的。但也竟有些端正的閨秀上了當，飢不擇食的更不必說了。因此這則「本埠消息」發出後，確曾引致了某方面對孤島正義人士主持的憲運施以更大的鉗制，因為牠是「包辦」和「動搖對中央之信念」的

臨書之可怕，有甚於「以訛傳訛」者，這就成爲所謂「攻勢」。

六月十日

看馬戲

一個從柳州來的朋友，一到桂林便熱烘烘地動心於銀宮戲院的馬戲。我們住在桂林的人，雖然也知道已有這一種玩藝在開演，但對之倒很淡然。我真驚異於廣告的宣傳效力。

但去看過之後，我知道先前所想，是有點不對的。馬戲所以如此驚動一時，並非完全由於廣告，多少也由於事實，就是所謂「硬打硬」的真工夫。以前看過的一小孩入籠「一種瓜殺人」等等大把戲，看時雖曾毛骨悚然，但一面又洞覺其中的偽祕，覺得自己的「悚然」，還是被騙了的。因此看過就索然無味了，也不曾有所感觸。這次很不同。這次除幾個平常的節目如「西洋跳舞」「巧走鋼綫」等等外，有好幾個節目真是驚心動魄的，而於我，則連冷汗也逼了出來。

當「羣童獻技」時候，一個十二三歲搗樣的女孩，站在一條板凳上，腰向後彎，直至頭還在腳之下，成了一條拋物綫。我覺得要是她也同常人的生理構造，則生理機構在長期的反常折屈中，多少總得受些破壞吧。但當演到「高空咬人」一節時，這一點遺憾

已是多餘的了。這一場先是一個大女孩爬上縱舞台面三四丈高的一個架子，跟着一個小女孩也爬了上去，而兩條繩子做成的長長的「天梯」，在她們上去後便拉開了。你只見高空上面這兩個孩子，在一條兩根繩子吊着的擺搖不定的鐵棍子上面坐着。演技開始了，那個大的，緊抱着小的，腳勾在鐵棍子上，打一個轉，身體吊了下來，再兩手一拋，把小的也吊下來：成了一個高空中的連環吊。然後，那小的用力把身體捲縮上去，緊緊的向太的身上攀，兩個在掙扎着，那小的的眼光分明露着恐怖。這時台下發出唏噓聲，但終於爬了上去了，鼓掌聲又響了。在每一次的緊抱、攀騰中，一落下來便要跌死。

——沒有取巧和僥倖，沒有絲毫虛幻，不就是馬戲的真實之處嗎？而多數的觀眾，就在期待着，欣賞着這樣的場面，找尋着這樣的刺激。

論驚險，真可與海京伯馬戲團相伯仲。幾年前看過一張海京伯的電影，裏面也着實節節勇猛，處處驚人。但那是真正的馬戲，受犧牲的是獸，譬如，宰牛餓餓虎，馭馬越高崖。而在我們這裏，雖叫馬戲，那裏有馬？是人充了牛馬。演的冒生死危，反生理常態，以刺激別人，養活自己。而看的也唯恐其不險。銀宮大戲院一連演了一個月，現在還在廣告着第三期的節目，盛況是可以想見的。

看險，在我們中間似乎已成爲一種文明。站在街邊看押囚犯赴刑場的行列，是不能

算算的。親自跟着到「法刑」的地點，圍成一個三面的圈子，只空了右邊幾步的一角，這才方便於慢慢觀賞。醫學上有一種很古怪的病，叫「虐待淫亂症」(Mortification)，我是最近才知道的。男人女人都會害。這類病人一切正常，祇發着一種損害異性的狂，要使異性在交媾的時候受着破損以上死亡以下的痛楚，自己便感到舒適貼服。這是最可怕的心理病。社會也好像有着這種古怪病，愛看別人的險，以別人的險為樂。魯迅先生說過，酷刑會使人民變成厚皮的癩象，但我想這是指身受的而言，至于高高興興去看的，大抵是從此知道做「歹人」的結局是殺頭，所以即使肚皮餓，也一齊朝向一條雖然狹窄但極妥的道路，慢慢地爬的多；自然最後也有不能溫飽的，但絕不會挺而走險，只希望着獎券之類，或者等待賑濟，收容。後來則終於成爲順民的根性。這是世風日下，國民道德淪亡嗎？實在是「殺一警百法」的效果，暴屍，懸首，「畜衆正法」，都是保持着這種文明的。

人道主義在歐洲，正像民主主義一樣，已經是虛幌子，用來作緩和和誘餌下等人的工具了，但在歐洲以外的許多地方，却還須提倡。雖然牠不能最後的最有效的解決問題，但它代表着反殘忍的心理，算是比封建的暴虐進步的。俄國沙皇時代的流放，比起我們軍閥時代的餓冷飯，用香火燒，鍊住手指頭往上吊，用洋油往鼻孔裏灌，讓受之者在兩三年後才慢慢積傷死去的方法，還有着顯然的區別。所以「馬戲」逼真的程度，就有東方西方的不同。

一九四〇，六，四。 四一，二，六日改作。

祭鬼和招魂

作了兩點生活上必要的勞動力的出賣之後，慣常總愛在歸途上慢步溜躑，看看街景，使緊張而疲勞的肌肉融鬆一下；這兩天晚上，靠南門一帶的住戶大多忙着燒錢，一條平時深黑的南環路，頓然變得四邊發亮，熊熊的火燄，東一堆西一堆升起來。我邊走邊想：「啊啊，原來是中元節又已經到了」。

照我們鄉下人的沿習，把中元節叫做鬼節。據說一年之中只有這一天，所有的鬼們都得到閻王恩赦，回到本家享受生人的祀祭，因此這一天的儀式是非常隆重的。我懂得人事之後，我們的一鄉因為開通的緣故，繁縟的儀節已減省了許多，幾乎只剩了單簡的供祖了；但從曾祖母的口中却常常聽到：從前是在初六七便開始鑿錢，摺衣物的，恐怕祖先打鑿腳，還要印許許多多的馬。那個一尺見方的馬印，我小時還常常拿來作泥餅模。現在的人已經學會了坐汽車，大概打鑿腳的或者高貴的鬼，也一定趁着汽車回來，根據這一想頭，我們鄉下也有些人改了燒紙紮的汽車的。

如果祖先是有什么罪孽的，據說，閻王便不放回來，不過有一種補救方法，就是招

隨談兩則

談時間

我們中國人的大多數實在是不大愛惜時間的，雖然有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古話，但還是追求一寸金的居多，光陰倒反成尺成丈地虛擲了，譬如用又麻將消磨歲月的就是。

即使三天不見，在街頭碰面，也會拉雜談上一二十分鐘，馬路上爭風毆鬥，或者一輛車子輾傷人，便站近去看大半日，赴會不準時，談話聊閒天，或談女性不必說了，看張報紙，翻來翻去過了一天，或者連報也不看，睡睡覺，吃吃零食，照例做一點生計便完了一天的時光的，也真佔我們中的大半。

球場上，與賽的雙方都到來了，但並不會就按時比賽的，登人名劃界綫，以及一些說不自原因的等待，那時間的總和實在不短於比賽，而觀衆呢，也可以毫不動容地看着登人名劃界綫，看着比賽員和球證出沒於人叢……但自然，他們是按照着時間早已到場的。

西洋人有一句話：How goes the enemy？意思是「幾點鐘了？」用enemy（敵人）來譬喻時間，可見他們那種對光陰的惕勵精神，就這一點說，是比我們「浮生若夢」的人生哲學勝過的。

時間不一定對猛人碩士才有用，平常人爭取它來多作點生計，正當地為衣食謀，也是改變人生於積極之一努力的。歌德說：「只有那每天為着生活和自由而奮鬥的人，生活和自由才有價值」，就是指的這一點。

十二月二十九日

也談避諱

把外國的名字翻譯過來，是完全依據音讀，很少關及字義的。平時讀的人也不會想到字義，譬如今年羅斯福私人代表來華，香港星島日報把該代表的名譯作寇里，國內各報則譯居里，據音讀，是都不錯的，但要是在滿清，前者恐怕就很難免掉詆毀的罪名。

遼金入主中國，正值當時中國政治腐敗，綱紀紊亂的時候，中國不能不滅亡，但中華民族對異族的仇恨和敵視，卻是與日俱增；沒法抵抗，就把他們的名字譯得古里古怪，表示一點辱蔑或嘲諷，譬如勃極烈，小哥，蒲盧虎，畏吾兒（國名），八狗等，像這

樣一點近於文字遊戲的抵抗，自然敵不住異族的鐵騎，但也不能見容於後來的異族統治者，滿清高宗皇帝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的時候，便把所有「詆讟」的譯名都改易了，而且勒令天下一律遵改，「小哥」變爲「肖格」，「八狗」變爲「巴噶」，那含義，不但平和，而且尊敬了。

避帝王的諱，是養成大家對帝王恭敬，明白其神聖不可侵犯，避仇視辱蔑之名，也同樣是保持侵略者的光榮的，看歷史上的譯名，常可以體會出主奴的眉目；但那是從前正是民族的仇視、怨恨不能發泄的時代，在現在，我們的仇恨寄托於抗戰，實在宏壯得多了。

一九四二，二月五日

新 棘 錄 (五則)

作 品 與 時 代

戰國策第十期上，沈從文教授痛詆「流行的作品」。而又罵得技巧，並不說這人寫流行的作品，只希望有「永生」的，「給人類一種較高教育」的作品。

不消說，這種作品是「一味求全討好」、「政治上的小幫閒」的作家們所寫不出來的。只好待諸養精蓄銳，不沾俗塵的教授們去寫。然而抗戰已經三年多，我們還寫不出來的，只有戰國策這一流的小冊子。「希特勒與朱元璋」，「所謂中國外交路線」等等。「討主子歡心」的東西不必說了，「論婦女」之類的荒淫和卑劣，實在也變過幾頁去不多。不但談不上「永生」，現在的人恐怕也不易知道怎樣以性的「親暱的剎那間」去證明女子應該安於「生物的平等」。

所以沈教授是不歸咎於作家的，他說：「這是時代」。現在的時代，據戰國策的君子們說，是回復春秋戰國時的「大政治時代」。戰國時代的作品是有留傳下來的，但並不是生為戰國大而替民國人寫的作品，恰好正是寫着當

時。所以現在的時代也真的沒有好好地讓教授們寫「永生」的東西，辦起刊物來，一開口便又不免是十足地道的「庸俗」、「功利」的「宣傳品」了，雖然所「討歡心」的主子與「流行作品」所討的確乎不同。

這真正是時代的悲劇。「有亮光嗎？不能說沒。在那兒？可難說。」就是教授們所下的這個悲劇的註腳。

「把船頭掉轉」

又是戰國策上的文章。這次談的是哲學，陳銓教授作，題目叫「尼采的道德觀念」。下面所引錄的是結論：

處在現在的戰國時代，我們還是依照傳統的「奴隸道德」，還是接授尼采的「主人道德」，來作為我們民族人格的鍛鍊目標呢？

薩拉圖斯達的辦法是：

「他把船頭掉轉，離開「父母之邦」，經過狂風暴雨，泛流到寥遠的
海洋，他達到「孩提之邦」，那兒有超人的虹霓和太陽。」

意思是很明顯的：我們應該接受「主人道德」。主
體的全部內容，據陳銓教授

所述，是：「權力意志的伸張，強者行動，弱者服從」。果弱者要抵抗強者，那便屬於「奴隸道德」了，結果是要弄到「世界不能進步」，「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的。陳教授還舉了一個例，譬如鷹認為吃羊是「善」，然而在 眼光看來就是「惡」。鷹當然不需要善惡的道德觀念，來拘束他吃羊的行動，只有柔弱的綿羊，纔需要創造一種規律，保護他們。

可惜我們目前正是羊，不是鷹。我們又不曾好好地給鷹啄去，而在反抗。但也不緊要，因為可以照薩拉圖斯達（雖然他不過是凱撒大將的小幫閑）的辦法，「把船頭掉轉」的。這「掉」自然需要非常的勇敢，因為他絲毫不怕可以預測的暴風雨的襲擊，而且即使最後掉不轉，沒在「寥遠的海洋」里，也不失其為「主人的道德」。阿門！

策士的圖目

這次歐戰法國的潰亡，聽說第五縱隊老早已經支配了作戰的首腦部是原因之一。這好像是不可解的事情。

其實，納粹式的殘暴和專橫，是代表世界文化的沒落底一面，這一面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的一切土地，因而納粹總機關可以輕便易舉的糾合一切反民主，反進步的惡

勢力，這五縱隊也就在這根源上面普遍發展了。

譬如，我們目前正進行着與帝國主義戰爭完全異質的民族解放戰爭，但在一些自命策士們的論說上面，却把我們的戰爭定型為「眼前要戰勝敵人，將來則安定亞洲」；怎樣才能安定亞洲呢？要「清算我們過去的民主政治」，因為「我們『進步的』威爾遜主義老趕不上他們（日本）『落後的』俾斯麥政策。」現在只有跟「我們這位散頭髮的朋友（希特拉）走」，因為希特拉的國家才是「全能的國家」，「民主政治的你一言，他一句，消耗時日，勞而無功的機構，不適合於戰爭嚴酷的條件。」

第五縱隊並不是什麼從天而降的怪物，而是一切國家內政治、文化的倒退份子底最尖銳的代表。從「均勢論」到「德意路線」到現在公然主張以華國家機構來適應「全能的國家」，這應該是我們警惕自己的第五縱隊的時候了。

英 文

本報記者：因不世遺留而人而開派。

本報記者：因不世遺留而人而開派。

去年夏間，香港國家日報曾經刊了這樣的一條「香港雜語」：「我在公共汽車邊看見一位西眼楚楚的青年，正在用心地翻譯着英文雜誌。」

「他在翻譯着英文雜誌？」

「他在翻譯着英文雜誌？」

青年不知所云，無可答話，面紅耳赤，連忙下車而去。

這實在是一個諷刺，也使人想起學外國文的空疏的可笑。但是，再想一會，又覺得還應該問那個青年學英文的動機如何，如果他是爲着想多看些世事，爲着學習，而不是拿來做幌子，則不能應答西人的問話，也實在不算什麼。學英文與做西崽原不必混爲一談的。

在教授學者辦的刊物上，我們可以讀到幾乎每頁十個以上的英文註引。譬如說到希特拉縱能贏得這次戰爭，就必加上（Win the war），「但如何贏得這次和平」，又加上（Win the peace），「國際關係」的下面是一個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強國」的下面又是一個 The Great Powers。

教授們的英文程度是不必懷疑的，然而這樣一來，讀者却感到浮薄，學貫中西的寶貝般的面子，反而丟掉了。

可笑的常常不是學，而是學會了或自以爲會了後的作用。

「偉大的捕風」

據沈從文先生在習作舉例里說：世間的事情，真是「虛空的虛空」，但知道他是虛

空，而又偏去追跡，去察明，那麼是很有意義的，這實在可以當得起說是偉大的捕風。

沈先生並引一段法儒巴斯卡爾的話：

「人只是一根蘆葦，世上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這不必要世間武裝起來，纔能毀壞他。只需一陣風，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了。但即使宇宙害了他，人總比他的加害者還要高貴。因為他知道他是將要死了，知道宇宙的優勝。宇宙却一點不知道這些。」（周作人散文鈔）

我們就承認人是一根蘆葦吧，只要他並非一生下來便希望被摧毀，而面前又有着加害者（即使僅僅是宇宙），就可見世間沒有完全虛空。何況還有人與人的爭奪。巴斯卡爾的學說，我不知底細，只知道他雖然是十七世紀的信神論者，但他還承認着人和宇宙有戰鬥，（縱然把人的力量估計很低，甚至最後取消於有神論），否則他便不會研究水的壓力等等的。至於我們的教授便不，他把一切世事看作非現實的東西，「虛空」。所以就可以「爲而無爲」，「消遣與享樂，即爲向虛無有所要求，故無防礙」。

巴斯卡爾主觀上否認人生的積極意義，但客觀上對人生却是有所裨益的，因為他還在做。中國的這類學者做了些什麼呢？「偉大的捕風」！

一九四〇，十月

空白页

第

二

輯

「女性應該安於生物的平等」論

昆明出版的戰國策第十一期上，有尹及先生「談婦女」一篇文章，主要的意思如下

記：

我們如縱眼觀察生物界中雌雄絕對「平等」，在牛馬貓狗虫魚鳥獸的世界裏，絕無男性壓迫女性的事，若有則只有女性欺負男性，如一種蜘蛛名曰「*Arachne*」，其交尾後雌的竟把雄的一口吞食！普通講來，生物界裏，在性的要求上，雄的是可憐的一方，雌的不答應，他簡直沒有一點辦法，所以雄的非要百方打扮，百方引誘其雌，如雄孔雀之顯其美麗之尾。自然界似乎早就安排好：在「雌的親嬭」上（Sexual Intitescence），男女二性不能有上下，優劣，高低之分，不然就會失却性的作用。性的作用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盡致；在性的行爲上，男女相遇絕對是「平等者」（Egals）的相遇，在那親嬭的剎那間，絕無貧富，智愚，貴賤，賢不肖，上司下屬之分；雙方是生物界之一員，平等分担任延續生命的責任。最平等的時候是在那時，最快活的時候也在那

時。所以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上自皇帝下及庶民，老翁都罵過太太，也被太太罵過，這相異就是「平等」的表現。性的平等是自然的，駐定的，生物的（Biosocial），其他種種的平等是人為的，不自然的，強做的。

從這個基本觀點我們又可以推得以下的論斷：即女人的真正位置是在「家」（Home）裏，因為只有在「家」裏才能得到真的，生物的，長久的平等。在「家」外，譬如說，參政會，所得到的平等是假的，人做的，暫時的。在「家」裏，因應付大政治的需求，樹起所謂女大三民主義，因「禮拜堂」，「門口」，「廚房」，「Under 孩子」，也就是「賢妻良母」的變相說法。意大利從前在詩人如但丁（Dante）書家如Boccaccio的感化之下，把女性看作產育嬰孩的工具，可見時代變了，女人們的在慕素里尼統治之下，把女性真看作產育嬰孩的工具，可見時代變了，女人們的女性觀也隨之而變。

中國現正從大一統局面，痛苦地呻吟地掙扎地變遷至戰國局面，則將來一切的道德，一切的信條，一切的理想，都將以牠是否增進國家民族在大政治中爭鬥的力量為試金石。兩性的關係，亦逃不了這個歷史的任命。

這一種理論，一看而知，是女子參政和就業的反對論。女子安於「生物的平等」，

便是快樂之源，設若不能安，而要相拒，相爭，造成「人爲的平等」，那麼據尹及先生說來，會像「妄以爲那邊是月，是一個好世界，誰知到了那里，才知道月亮的寒冷不毛，比地球還糟」一樣的是舍本逐末，徒勞而無益之事，更何況「從國家民族觀點看來，結果等於零」！

生物界的一般現象，兩性之間，的確沒有壓迫或者欺負這一類事。雄的沒有什麼特權，雌的如果不因爲純生理上的飢餓，也不會把雄的一口吞食掉。這理由並不很難懂：生物只是生物，它們祇知道本能的動作，交尾，吃，爬，唧唧喳喳……，不但不懂得作威福，行欺騙，而且也沒有辦法抵禦自然的淘汰。像古代愛爾蘭大鹿（學名 *Ochylus stags* antlers），角長到十一呎，而且很闊大，頭部的負擔太重，因此絕種。猛犸（*Mammoth*）的牙向上彎曲，尖端幾乎刺着自己的眼睛，終於也因此滅跡。生物界既沒有超本能的「一種支配自然的能力，因而也不會有超本能的支配異性的本領的。」

但人類就不很相同。人類有可以思索的頭腦，因此創造了所謂文化。這使人類變成萬物之靈，從生物界里超拔出來。在「創世紀」中阿當夏娃的時代，男女誠然沒有上下，優劣，高低之分，所以夏娃還有所謂誘惑的權力。後來恐怕也還有一段漫長的時期是比較順乎自然的，就是氏族共產主義時代的家系。因爲男子的不爭氣，讓女子發明家

農業，並從事於農業生產，所以男子只好離開自己的氏族出嫁到其他氏族去，以妻姓爲姓了。這是很丟男人的臉的事情，而且連聖人也不能倖免：「舜象兄弟，舜屬有虞氏，象屬有虞氏」；堯姓陶唐，但兒子丹朱却姓有扈。

這時代到底維持不很久，因爲人類的文化在進步。所以到了國風的七月流火里面就已經說「女執懿篋，遵彼微行，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了。——奴隸要把處女獻於公子，可見也就已經有了貧富，智愚，貴賤，賢不肖，上司下屬的分別。奴隸社會進化的地位，貧愚賤不肖的一層自然更不能當人。因爲是女性，所以在不能當人的一般奴隸地位之外，還有性的奴隸。男人不一定要徵求同意就可以作性的行爲，而且還縱慾，放肆，威迫和奪掠。女人自然要靜靜地守着節烈：在「家」裏。元朝好像有過一個什麼皇帝，除一后三妃和已有名字的三十多個「嬖幸」外，還要劫奪宗室的姦婦，有丈夫的，把丈夫殺了，沒有丈夫的實驗出不是處女，也殺了；後來因爲與皇太后的侍婢亂，連母親也弑了。那時候的女人們不知是因爲還沒有懂得「性的親權」的威力，還是用了不奏效：並不能免於犧牲。自然也有不致被殺的，但又得等待着殉葬，從死。所謂「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就是諛贈這種節行的。至於庶民，稍爲嫌遜些，稱爲「賢」

「良」。

中國長時期處在禮教的統治之下；歐洲則處在宗教統治之下。禮教和宗教同樣的是人壓迫人的工具，智富貴賢壓迫貧愚賤不肖的工具。也許「上自皇帝下及庶民，老爺都罵過太太，也被太太罵過」，但這相罵不是對等的；在沒有取得經濟上政治上的平等以前，女人反抗的效果是不會大的，何況還有無形的禮教宗教在抑止着反抗的動機。

介乎宗教的逝去和新思想的到來之間，歐洲發生大市民階級的革命。婦女參政運動是革命的一個環節。娘兒們也提倡所謂「如他不打破玻璃窗，我即不認其有嚴重性」的實際行動，到議場搗亂，向內閣總理擲石頭，不得不使貴族們駭震了。這種革命在中國爆發得稍晚，辛亥以後才有女子參政這一回事，但情勢也不弱，據說沈佩貞女士曾經一脚踢倒議院門口的守衛。這時期是人的醒覺的初期，人們懷有熱情，需要自由；但在舊的權力周圍，到處都是自由的桎梏。因此開始對一種歷史的傳統懷疑以至憎恨。女人要打出廚房，她們要求自己個性的解放，個性的發展。作爲這樣一種苦悶的象徵的如易卜生「傀儡之家」中的娜拉，易卜生給她的最大責任是求真理，求自由，自己負責做人。

然而性靈的解放只是婦女解放的關頭，不是結果。當更大的搏鬥和更重要的關頭到

來的時候，單依位於初期的覺醒底熱情，是容易冷卻的。市民階級的空洞理想會遭遇着恐懼，猜疑，以至於空虛。就在這時候，人類的獨裁者開始把千萬娜拉趕到禮拜堂去，趕回廚房去，「看作產育嬰孩的工具」。但同時愈更神聖的另一個鬥爭，却壯大起來。因為這「鬥爭」站在「大政治的需求」的反面，所以尹及先生絲毫沒有理會，他只看見了三K主義，而且勇敢地暗示中國應該「痛苦地，呻吟地，掙扎地」學這一種樣。

——人類的創造文化爲什麼一定要經過人與人劇烈的鬥爭這問題，有時想起來，頗爲吃力。但在這種場合却是非常明白的：有人在「一種暴力的文化底下挺身而出，要用暴力使這種文化維持和延續，因此憎恨暴力的人們也必須首先不憚於作戰，才可以活下去。是的，「大政治的鬥爭」，但這不是歷史的循環或者重演，不僅僅是表面上的由「大一統」進變至戰國局面，而是舊新的文化底成的前夜，被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間決定的鬥爭。然而在「大戰」的此刻，勇敢的戰士們又偏故作鎮靜，「搬弄知識，布設玄虛，向你說『性親屬剝削』」的道理者，是什麼緣故呢？他要把你弄得愈朦朧，他的襲來才愈更方便。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女子能力不及男子」論

「女子的能力不及男子」，這在我們的社會似乎已經是定論。聖人，先王，御醫，宿儒的理論怎麼說的，不深究了，總之，結論已經達到。學府，議府限制女的位置，機關不收或限收女職員；爲什麼限制？爲什麼不收？女子的能力不行呀！「新墾地」上江山先生告訴我們，這是一事實勝於雄辯。

沈從文的「婦女回到家庭」和尹汲的「性的親嬖剝削」論，老實說，很易露出破綻，是別具用心的詭談。說婦女回家去便沒有婦女問題，忘記了婦女原來就是在家里的；說「性的親嬖剝削」是女權的至高表現，則至少「曾經滄海」的人不會相信；立論堅牢，拿動不得的「能力不及」論，因爲不及，就只好屈居於男性下，就只好回到廚房去，這是社會的淘汰，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江山先生斷定一切女權論者的話「都是空談」，而「這根究底，這還是婦女的本身問題」。並且還引了例證。就我看來，這是這次討論引起的頗重要的問題，爲詳盡起見，將江山先生的原文剪貼一大段在後面：

爲什麼？理由很簡單。在一般機關里的工作者，不是有很多女職員嗎？她們本

是在要求經濟權的平等嗎？可是我要問這些女職員們，你們都在盡力於工作嗎？是的，在話劇團里，宣傳隊里，她們都在盡力於她們特能的工作，換一句話說，在它真正辦公的機關，頗不能說她們都是一些「戀愛至上」的「花瓶」，但如果上司官長秉公辦理去親自考勤的話，不用說，「女職員的成績最差」。請教：這種經濟權的平等，是真平等呢？還是假平等呢？

話又拉開來說，這要歸究於「能力」的問題了，口口聲聲的說：「女子的能力，並不低於男子」，事實勝於雄辯的，這是「強辯」。

「平等」不祇是「口號」，要靠實際行動去支持它，比如在這一次抗戰里，汪精衛也曾有過不少精闢的言論，可是，他終於跑到日本軍閥的懷抱之下，去做了「姨太太」。

一切問題，時常可以從小處着眼，去判斷大體，這裏，我們不妨從努力「女權」運動的婦女領袖們去觀察：她們的姓名上，不是還加上她丈夫的姓氏嗎？在一般社交的集會裏，她們相互間的稱呼上，不是在喊着「×太太嗎」？難道這又是「平等」嗎？不，這乃是「侮辱」。

「回到家庭去」，婦女們認為這是一種束縛，侮辱，那麼，「難道這是男子的

任務嗎？本來「人生以服務爲目的」，家庭也是一種職務，不過是範圍和方式的不同而已。假如中國所有婦女們都說：「不回到家庭去」！那麼，還不如直截了當的說：「不要家庭」，甚至於女子和男子性交，這也是一種侮辱。因此，「這是一個危機」。

江山先生所列舉的，除「在一般機關里的工作者，不是有很多女職員嗎？」一句外，我都承認是事實。但這是「既成事實」的可怕，也可以應用到「花瓶」來。機關上有了「花瓶」，女子就一向被認爲不配或不能夠做事。「花瓶」怎麼出來的，如果清玩的人當然說「花瓶」原是「花瓶」；但實際呢，倒是先有了花柄，有人把花柄插下去了，這器具才叫「花瓶」的。然而天下間只有臆罵「花瓶」的人，從不聽見過罵「花柄」或造成「花瓶」的環境。在話劇團里，工作隊里，她們能夠盡責或工作成績好些，不是江山先生也承認的嗎？那就因爲團體的環境不同於「真正辦公」的機關的環境之故。如果說女子談戀愛，多瑣務，所以「能力」低落了，在現在，是有這種事實的。但女子並非生來就一定要比男子多談戀愛，一定要把戀愛當作「至上」，其所以「多談」，「至上」，那就已經包含有不能不的社會原因在了。所謂「結婚即職業」，真是大多數女子所希望嗎？不過社會雖然標告着許多好聽的招牌，說同等待遇，說提高她

們的能力，但階地豈又使着勁，把旁的路擋住（不過說起來的時候總歸答她們走不進去），只留了上我鈎來的一條。上之所好，下尤過焉，現在的機關，社會，主宰還操在男性們手里，如果不能担保男性們不談戀愛，如果承認現在追求異性的方法，現在的「戀愛」，還實在有些稀奇古怪，那末，機關上那種說長道短，品足評頭的氣氛，叫與從於人的她們，怎不受影響，怎不漸漸陷入四面八方的軟包圍？受不了的，走了，如果還戀棧，就必須迎合環境，不過結果是一樣的，總是一女子能力最差」的明證。

所以能力，也和地位、教育一樣，是決定於社會關係的東西。在「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聖訓下，鍋盆溺襪，幾千年來已把她們磨得一點銳氣也失掉了。她們要表現能力，就只有在家務上表現，外界社會惟男人才是「治」者。現在的婦女領袖，姓名上要加上丈夫的姓氏，稱「×太太」者，我想原因也不外如此，這是男權的治績，「從小處着眼，去判斷大體」，也不足以判明這就是婦女的低能的。

中國歷史上的烈女傳，自然並不爲着記載女性們的才能，而是記載她們的溫馴，樂死，善終。但中國歷史上，卻有過不少女性叛逆了家。要求到社會上做事情的，像在朝的武則天，李選侍，在野的唐賽兒，她們何嘗沒有大志，也何嘗沒有卓絕的才能？而且不正是江山先生所說，「靠着實際行動」的麼？但反對的人們一定要把她們描繪成妖怪

，說是人類以外的羣種，羣起而攻之了。——即使有很少的女性獲得了平等的機會，也終歸要被削低，刷平的。

江山先生怕中國所有的婦女們都說不回到家庭去，中國就「不要家庭」，這是過分的擔憂。且不說家庭也有新舊的分別，就是現在的喊離開家庭的桎梏，又何曾有萬分之幾的女性離開了呢？而正在掙扎的時候，「性親癩剎那間」論，「神經衰弱症」論，「能力不及論」已經湧起了。舊桎梏之大，是應該想像到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但可怕之處，正在於所服務的「範圍和方式不同」。不信，請慣在辦公廳範圍，慣過按鈴叫人簽到溜走的「方式」的先生們，回到廚房範圍服務那烟鹵油鏟試試看——但要長期，要不是興之所至，旁邊站着用人才算。

已經有一個國家，男子能做的事情，女子都能做。引擎駕駛，科學家，兵隊，飛行員。我想，只要把男女服務的範圍和方式慢慢平等起來，女子的能力自然可以達到男子的水平，和男子一齊進步的。而且這也並不僅僅是「精闢的言論」。

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

「挽救瀕於既倒」

新學報婦女問題討論上，有一位章慶先生提出「一個折衷的看法」，他說：

「及這種見解，不為完全無見，我們略把他修改一下，「女子育嬰養孩，加強國力為唯一使命，求政治上，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另外一個問題」。那麼便語平氣靜得多了。這我們也可武斷一句，婦女要是只爭風頭，而捨育嬰養孩之任務於不顧，亦夫其應負之天職！如果飛君女士，只以爭「政治經濟的……平等」為根本之任務，疾呼婦女們不要育嬰養孩，那便根本錯誤，國家也隨之糟糕了。

又說：

三從四德雖是封建時代的禮教，但它并不是要婦女做牛馬，當奴隸，而是要婦女們做到賢妻良母的訓條，許多婦女，往往以為非把它推翻，也就如手銬腳鐐，暗處牢籠，永遠不見天日，豈知違反了三從四德便成爲人不齒，爲人鄙棄的臭皮囊，其實三從四德是一個「節」字的涵義，男子盡忠，女子盡節，是

吾國所有如這般，所以我國有婦女們永遠存在這一點。

上面所說這段話，雖離原題較遠，但宣揚正義，挽回瀕於既倒，是我的脾氣，而尹及先生的主張婦女在家裏，表面上雖是那樣說，恐怕他也正顧慮要挽回婦女的自由太過於擴大的頹風，用蘇東擊西的戰術，要親愛的婦女們，知所收斂罷了。

章康先生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婦女們應以處理家務爲先，行有餘力，始可談所謂政治上經濟上之平等」（本引自同文）。因爲婦女們離開家便是放棄「育嬰養孩」的「天職」，「國家也隨之糟糕了」。

無論婦女怎樣唱自由，唱平等，歸根結蒂，你總得「養嬰育孩」。育，在進步的社會制度，已經是社會的責任，有托兒所減輕婦女的束縛了，但養，是總得由女性的生殖機關，不能直接由男性養出來的。這和女子無能論一樣，是男女異權以來反女權的英雄們最堅實的證據。拿破崙法典上不是說着嗎？「女子供男子生子，妻不能生子，便不是妻」。

不單養，那結果當然是另外討了。這和中國的女訓是照合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七出裏面就有「無子去」一條，養不子兒子的罪惡等於「淫」，「盜竊」，「殺

從男家「出」了出去，「無後」，不分明關係着兩性的嗎？只歸咎於女性的生殖機關或命運，而就此判決「便不是妻」，隨便掉換，豈不冤哉。

不過拿破崙和中國的聖人們並非爲「國家的糟糕」打算，他們是直言生子爲的「供男人」，爲的免「不孝」的。現在法西斯的極權者，也唱三民主義，說女子是養嬰育孩的工具，但理由卻堂皇得多了，不是爲日耳曼民族呢，就是爲的「光榮的天職」。他們的婦女大概是在靜如止水，服從訓條了吧，所以即使將來軍事潰崩，也不能歸咎於女子放棄天職；中國的女子雖然還不見得像這樣歸順，但我想，也不必給她們預約「國家也隨之糟糕了」的責任的，——她們養嬰育孩的歷史，不就是國家糟糕的歷史嗎？

女子終不能不生孩子，這是生物界的現象。如果因爲女子生孩子便把她們幽禁在這「天職」裡，也就是要她們安于「生物的平等」，韋康先生美其名曰修改尹及的意見，實則不過抄襲。「男子盡忠，女子盡節」這「吾國固有好道德」，已經煊染了千百年的中國歷史，爲什麼在我們要改革的今天，不能讓女子也盡忠，要男子也盡節？——自然，參與國家的政權，或者社會革新了，女子仍一樣要生孩子，但束縛，痛苦，已經減少了。要挽社會的狂瀾的人，首先不要被社會的舊骸骨迷住，否則縱然掛了「宣揚正義」的金字招牌，事實上只能望洋興嘆，於狂瀾是損益都談不上的。

二月二十日

女子·聖人·革命

婦女問題，近來頗成爲談論的重要題目，有人說是別的事情無可談的緣故，我想也許真確，但至少還應該有一種原因在，就是婦女是社會構成分子的一部份，它代表一種社會力量，歷史已經走到舊社會和新社會的分界點，談論的趨勢因之也反映着一個根本問題了。

但如果說婦女問題的存在和談論，已經很久遠，就進化史和人類歷史說來，未必是的。生物的時代和人類初期，不發生婦女問題，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時候，婦女問題存在了，但不能談，也不會談。那時候用的是男性裁定法，印度經典上說女子是「天下之至穢」，基督聖經上說女子是「地獄的門戶」，自然都是他們的主張，給她們判定的，她們承認了；厭惡之外，還須征服，所謂「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外國也採用的，把女人聖壇作永遠服從的宣誓，放在結婚典禮中，女子呢，不消說也「婉婉聽從」了。婦女問題的能夠提出，能夠談論，是這些聖典和聖典崇奉者的實力統治稍衰，奴隸有了自覺的時代，離我們現在實在很近。

因爲近的緣故，有些性急的先生們，聽來聽去，就目爲一難說千萬遍，等於吹牛皮。真的，國民革命以來，不知多少革命領袖、社會學家爲婦女解放吶喊過；搬理論，講道理，現在由上海新文化書社彙集印行的，就有厚厚的三本。別人耳朵聽膩，婦女本身並沒有打出什麼天下來。婦女問題不存在或婦女解放不能發生效果的持論者，說是一事實勝於雄辯了。

但這裏面有一層，他們卻沒有想及，就是「革命尙未成功」。國民革命的任務又是推翻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統治，另一面，當然就是解放被統治被壓迫的人民。既然婦女也是被壓迫者的一部份，革命尙未成功的事實，不就證明婦女問題的存在是合理的嗎？

革命的不能澈底成功，另一面，就證明反革命勢力的存在，的宏厚；從婦女問題看，足見釋迦牟尼，耶穌彼得和孔孟的統治雖已衰替，但那餘炎，尙足臨弱者以萬鈞，幾年前我們還讀着孝經，便是一例。

釋迦、耶穌、孔孟或者尼采們的聖典的精義，除壓迫女子回家去外，還有勸導、教育的方法，「十年姆教」，就說明着潛移默化的功夫。他們有整套的家庭理論，而且這些理論必須最後關係到國家，天下，人類。所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夫

階級的，但在那時候的女人們並不覺到。這是教育的成績。

現在的反女權論者們，他們也那裏承認自己是反女權？他們不過勸女子們放棄那「徒勞無功」的女權運動，明白「真正的位置是在家」里，從而達到女子和男子相容，相輔，相成罷了。青出於藍，名流們的儻論，和聖人原是差不多的。本來，人類之間（兩性或兩種或兩組）不應該有相殘，有凌壓，有虐待，反過來說，就是應該相容，相輔，相成。何況同一種族的男性和女性。但真實的世界，却並不這樣簡單，我就在上面所舉的新文化書社刊印的婦女問題討論集上，看了漢民先生的意見，他說，「男子一個階級，不要自私自利的把持，好像現今資本家對於勞動者一般；要曉得都是人類，沒有不同的人格」，漢民先生是一個革命者，他的話真不失為一種啓示：兩性間或兩羣人間的問題，不都顯然由於「把持」而產生嗎？革命者的話平直，但常切實；聖人、聖徒、名流學士們的話頭頭是道，卻多半並不預備做，至多也只希望別人做。譬如一面叫女子安於「生物的平等」，一面又大談其相輔相成，便是這樣。

但如果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天，人們都只知拾聖人的唾餘，寫點欺世文章，則是不對的。有些真正的英雄們已經建立起更直截了當的理論了：男性與女性，一個領導

者，一個被領導者，平列起來，不是不倫不類是什麼？聲勢和實力較名流學者顯赫得多，歷史上只像拿破崙的樣子了。

現在還有人學那位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子建，拿一點可憐的同類感打動別人的心，希望乞取憐憫的麼？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

男女與職業

反女權論的人們，提出一種理由，說女子如果到社會上作事情，就職業，無形中等於排擠了男人的位置。證據是美國現在正由男人們發起「護職運動」，把婦女趕回家庭去。

事實也是如此。美國男人們反對女子就業，去年已由「宇宙風」介紹和報導過了，真可說風起雲湧，盛極一時。美國雖稱金元國，但常常鬧經濟恐慌，每一恐慌，便千萬人失業，所謂餓殍載道的情形，也會在紐約、華盛頓的大街上出現的。人們遇到失業，總難免發些尤怨之詞；幾百輛汽車用汽油燒毀，幾萬包麵粉掉到海裏去的事實，失業的人們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但他們不以爲是那些先生們擋住去路，只深怪女性從自己嘴邊搶去了麵包。被「不景氣」的波浪沖昏了頭腦，便不分青紅皂白，把家人路人，當作仇人看待了。

我們地大物博的中國，資源豐厚，不景氣是不會吹到這裏來的；但限制女職員不收女職員的風氣也正盛着。除掉說女子會奪去男子職業外，還以爲女子的能力低，身體弱

有的已經結婚等等。

中國社會向來品評女子的標準，是德性和佳麗；且又必須「無才」方「是德」，「弱不禁風」才算美。這段歷史並不很短，一直延續到將近于現時；現在忽而要求她們「有才」，要求她們能幹，而且以無才懦弱為甄黜的理由了。難乎其為中國女人矣。

但女性真正的困苦和男性真正的用意，都不在這里的。無才和懦弱不適於工作，不心卻適於駕馭嗎？說現在社會沒有無才、懦弱的女子的地位，實在冤枉。坐汽車甚至剪彩拋瓶，都不須知識能力之類的。問題在於一切依賴男性，與從男性後，就必須以男性的主張為主張，男性的榮辱為榮辱，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真正的不平等也就形成了。美國紀爾曼夫人說：「世界上幾十萬種動物里面，女性依賴男性而生活的，只有人類」。但她不知道幾十萬種動物中，懂得並且不斷製造着一切剝去反抗能力的奴隸的，也只有人類。

或者說，男女的平等應該重實際，不必驚高遠；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育嬰，裁縫，烹飪等等，和行政官，軍官，法官的職份雖不同，其為服務者則一，這正合乎「人盡其才，才用其長」的原則，就大處着眼，實在「與前線殺敵的英雄同樣神聖」的；這樣說來，「家」是女性真正的位置，「守家」也就是女子真正的職業了。這理論比女子低能

論高深，孕穩，各運轉，而且不動肝火，表明毫無排擠女人爭奪權力的意思。在這些中國的女性，在「不言外」的教訓下，已經蛻伏了幾千年，她們都是以「管理家庭」為職業的，幾千年後的現在，國家強盛民族復興，固應該不在話下了，即使真已復興強盛，有人竟會歸功于愚昧終身的庶人大衆中的弱者，你想，我們不會叫他傻子嗎？

擺脫奴隸，並不一定就變成英雄，爭女權的人們常拿花木蘭作比喻，其實，要求每一個女子都立即作成花木蘭，是勢所不能的。目前的目標不妨平庸些，如果千百萬女子能夠在社會上插足，各種職業部門不歧視女子，就可以漸漸達到經濟獨立了。

遠東最大的一座活火山，克里烏契夫斯基，一世紀半以來無數歐洲的科學家、探險家所屢次嘗試攀登都失敗了的，最近由一位蘇聯女子爬了上去，自然，她也是一位職業科學家。「人盡其才，才用其長」，但所謂才者，不也是社會的產物嗎？有人人平等的社會在，就證明女子並非天生的低能；而且足見有些男士們的一味排擠女子職業，也算不得真爲自己着想的。

一九四一、三、十四日

空白页

第

三

輯

作家二例

——談佛烈達渥地利與賽珍珠

對於一個人，特別是一個作家，如果僅僅由於一個時期內的著作便承認他的品質，是很難確當的。他整個品質的變革或暴露，必須依據於歷史的實踐底考驗上，證實於他對某一歷史階段的政治策略底具體愛憎上。歷史惡作劇，他鍛鍊人，而又使那些受不起鍛鍊的人在牠前面搖動，迷失，以至於反叛。

佛烈達渥地利，「日本的泥足」的著者，於國際形勢大變動後，在英國「新政治家」雜誌上發表論文，用一種挑撥戰爭的口吻寫道：「共產黨的思想以為戰爭可以使蘇聯趨於強大，使其他國家趨於貧弱。史太林締結德蘇協定的主要動機是由於恐德，相信這一協定可以使英德戰爭必然爆發。」這些硬派蘇聯為戰爭慾魚者的口吻，其主觀目的正在於挑撥一個更大規模的帝國主義反蘇戰爭，是顯明不過的。而佛氏也坦白地寫了出來：「現在英法德如果息兵休戰，德國就要轉而對俄，除了奪回俄國現在所佔領的土地，

還要取得許多別的地方。」（均引自「文摘」第六十期譯文，下同）

「由於不了解在這個歷史時期中法西與『共產』國家的酷似，這個人遂成爲列寧所謂的『社會的愛國主義者，』殊不知他們所反對的與他們所擁護的原是一邱之貉……在德國是國家『統治』土地與資本，在蘇聯是國家『佔有』土地與資本……唯一的分別只是俄國的官僚較之德國的官僚效能略低而已。」

對於我們中國人，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們在這裏倒真看見了一點「酷似」，——佛氏多少有些「酷似」於張伯倫首相，雖然不一定就是「一邱之貉」。張伯倫首相除了致力於「消滅希特拉主義」來表揚不列顛的「民主」精神外，錦囊裏實藏着「攻蘇十字軍」的最後一計。佛氏在熱烈地擁抱這種「民主」精神而叱責納粹官僚之餘，無怪乎也用「酷似」去毀譽蘇聯。然而不幸，英國的「民主」底真正價值倒被伯納蕭毫不容情的筆揭露出來；「張伯倫先生的意思是說，我們不打破德國的納粹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而代之以大不列顛的憲政，我們決不停止戰爭……不過在我們的憲政下，我們的工資勞動者在九年之中只找到一天的工作。」

新年特大號的「宇宙風乙刊」上，有一篇題曰「貴生論」的譯文，原著者是我們素

巢穴而避免危難」。她完全沒有理解到：我們的「放棄」是爲着更有力的打擊敵人，而不是純然因爲生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而「避免危難」。誰要是這樣想，誰就沒有了解中國。

生命誠然是寶貴的，應該惜。但在涎臉苟安的場合下，有些人就往往當作別論。抽出了全部的鬥爭的實踐，我們並不看見生命的真正意義。就中國今日的現實說，人民參加這正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甚至在戰爭中犧牲，也屬大義。爲什麼？理由很簡單：我們要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就需要暫時的部份的犧牲。生命至上主義是小資產者層的意識形態之一，牠的涵義是自私，個人本位，大義之前苟幸免等等；對於求進步求解放的人民是完全不適宜的。而且是一種罪惡。在中國，只有汪精衛這些完全沒落了的糊塗虫，才陷落於生命至上主義，反對必要的民族解放鬥爭。

由於根據是錯誤的，養珍珠不能不得出錯誤的結論。她認爲：「事實上，大家打得精疲力竭，其結果之無益於永久的事業，是中外古今一律的」。在這裏，她完全抹殺戰爭中正義的進步的一面。同時，她幻想中的中國的勝利，是由於日本在「佔領區的軍隊一待和平（！）來臨，則必漸漸腐化。」

佛烈達濃地刺和麥珍珠的陷入歧途，訓教了我們，也同樣地教訓了我們的作家。地位和聲譽並不能保證一個作家不背叛歷史和脫離時代，決定他們的，是他們自己的品質，和作品在歷史實踐中鍛鍊的結果。

一九四〇，二，十五。

談文化界的「紊亂」

中國知識分子的痼疾是自由主義。具體去形容它，就叫做「無可無不可」。這風氣一直留傳到現在，還未曾湮沒。「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是混沌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公婆爭吵甚或女的統男的打死了，道理還是大家都有的。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自然更其明顯。

「中學生」十八期上黃達三先生「給青年同學」的「如何拯救你自己」一文中，有下列兩段文章：

蒙蔽，紊亂，幾乎成了現代中國文化界最流行的現象，又是我國教育制度上最深重的病症，而在這下面受害最大的，就是青年同學。我曾眼見許多青年同學在一堆雜誌刊物之前，感受着迷惘的苦惱；因為很多刊物，大都是帶着宗派的意味在向讀者說教，知識見解未曾成熟的青年，有時不免要受着它的迷惑，信以為真。但聰明一點的，常常提出疑問：「爲什麼對於一件同樣的事，竟會有各種不同的難以使人相信的說法？」即使是誠實一點的，一時受着迷惑，然而祇要經過相反的客觀事

實的證實，在其矛盾的情狀下，依舊很容易使他們進入懷疑。因為真理終究是蒙蔽不了的，而嚴重的問題，是青年發覺疑問以後，只能感到迷惑，而不能找出事實的真象，使他們求知求真的熱忱，不免感覺失望；或在誤信的時期，要使他們在迂迴的錯誤的路上旋轉。

上面講過現在流行的刊物，很多帶着宗派的意思，他們站在各自的立場，對我們青年說教。宣傳原是免不了的，宣傳並不是罪惡。各人憑着自己的認識——對真理效忠，闡揚真理，維護真理，對一切自己認為錯誤的理論施行攻擊，這是對的，而且是必要的。但為着辯護自己宗派的政策或政綱，遂致抹煞事實，指鹿為馬，那並不是宣傳，而只能說是造謠。我們青年如果不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其危險恐怕還不僅是朱光潛先生所耽心的「誤認旁人的意見為自己的思想」，甚且誤認別人的謠言當為真理。我們即或別人是在為真理效忠，在宣傳真理，也必需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因為由他人的探討而認識出來的真理，我們還必須檢討，不然則正如叔本華所說：「自己的頭腦讓別人跑馬」了。

文化界的「蒙蔽」「紊亂」，其實並不是「深重的病症」，如果文化界「清一色」了，「天下有道，庶人不議」，那時青年同學大概不會有「迷惘的苦惱」，然而却要作

奴才，被清統是一例。所以有骨氣點的青年都寧願這一種「紊亂」存在，雖然能說話的限度，還不頂寬廣。何況實際上它是必然存在的，正如社會上還不能僅有一種人，有人坐汽車吃大菜，也有人拉包車領賑濟一樣。

但所謂「紊亂」，並不好像「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般一團糟。文化界裏面是有是非，也有黑白的。「一大堆刊物雜誌」之間，自然什麼都有；有的叫青年讀經復古；有的教青年洋服西餐；有的勸青年得過且過，莫管是非，一味讀書，自有出路；也有請青年看看世事，瞭解他們自己，瞭解現在的社會。這裏面當然也有着是非黑白，不都是「謠言」二字所可以包舉的。

宗派和立場縱然有很多，但真理和是非只能有一個。這個真理是客觀的真理，不是「憑着自己的認識」去認定的「真理」。因此合乎這個客觀真理的政策政綱就不能隨便自爲「宗派的政策政綱」了。「指鹿爲馬」是有的，但並非每種「宣傳」都「指鹿爲馬」，它們有分別，而且真正「肯用頭腦去思考」的青年，是看得出這分別的。

「真理」既然「終究是蒙蔽不住的」，那麼肯正視一下這「紊亂」的文化界的青年，自然「能找出事實的真相」，「求知求真的熱忱」在真理底明燈下將更光輝起來，絲毫不會「感覺失望」；可見真正「嚴重的問題」，倒反在於若干的教育界先進和學校黨

局不肯給青年們從傳統的狹隘思想解放出來，恐怕青年們接近了「紊亂」。於是青年們就渾渾然，馴服得好像羶羊，沒有一「誤信」也不會受「迷惑」，——然而麻木了，今天抗戰後方的學校青年，其遭遇如此的，仍不在少數。

朱光潛先生是決不會一「誤認旁人的意見爲自己的意見」的，因爲他預早就存有戒心，耽心「危險」。如果老早提防自己的頭腦會被別人跑馬的，也就該不去看書，但叔本華要是不看書，他連名人也做不成了。事情真矛盾。然而從這裏也就可以看見朱光潛叔本華之不足爲法。與其告白自己沒有抉擇，溶化的能力，沒有與壞思想戰鬥的決心，因此在一「紊亂」的前面趑趄不前，倒不如正視「紊亂」好。

一九四〇年四月

「作家慾」或一說

何家評先生在「新藝地」上告訴我們，現在正欲提高文藝作品的質，尤其是要掃蕩一般青年的作家慾。假若不根本滅絕這種惡劣傾向，結果必至在文藝界出現許多徒有其表而無其實的空殼作家的。

立論似乎諄厚，但問題還要分別論之。

大抵從事文藝活動而又未成爲「家」的青年，對於「作家之林」，多少有點憧憬和羨慕，這是人情之常，沒有什麼可怪的。即使想不到「作家」這樣好聽的名兒，也總想到自己作品稍有進步的那個將來。懷有這一類想頭的，並不完全爲耀己炫人，也可以是愛己及人的。對於已經成了名的作家，希望能接近，能交談，能一瞻風彩，當面學習，也是人情之常，無可厚非。只要是老牌作家的願意，則生人接近他，於習作總多少有些幫助。在蘇聯，很多青年都非常喜歡寫信給高爾基，或去訪會他，大多數當然就爲的太仰慕於他的成熟，希望從他那裏獲得指導。這是爲學習爲進步而起的拳拳之心，是摯誠的。

投筆以來，一文變青年」是比較大量地產生了，這原因一方面由於抗戰使青年更切地體感了現實，因而也從另外一個角度了解了文藝，從前以爲是吊兒郎當的玩意，現在許多潔身自好的青年也投身其中。一方面則由於原來的作家，至今健碩者固多，但功成名遂身退，或身陞而不移此道也矣者，亦復不少，至若因爲成了名，就惜墨如金，不肯輕率打草者，或掛着一塊作家招牌，明里經商，暗中通官者，更比比皆是。於是乎在某刊物某報端上便也有些未成熟的青年們底文字。這些只寫寫報紙文章的學徒，不可就稱之作家是確實的；但問起「有不有像樣的作品可稱作家？」那你叫他怎樣回答？連什麼作品是定爲作家入門的即「像樣」的，恐怕也不會知道。我想，一個真正成熟的青年，大概是不會每天在縈思那可以登龍的一篇像樣的作品，以至停止他日■■成熟的寫作的，他不過感到需要寫，寫了對大家有益，所以寫着。自然，在不斷的認真的寫作中，將來會發現這樣的一篇或多些也未可知。若因爲他們沒有想及或者還沒有寫出，便必須使之垂頭喪氣，連招呼作家或交遊作家（這裏首先還得請作家們肯降級）的勇氣也失掉，未免太苛刻了！

何先生問我們：「怎能希望他們寫出『優秀卓絕』的偉大作品來呢？」誠然，不能。但即使一點「慾」也淋漓得乾乾淨淨的「正牌作家」如何先生者，也不敢担保自己

「有這好的孩子，是不能瞪大眼睛問他『你將來怎能做參政員啊？』之類的話的。好且聽口呆，不知所云。」

「這話聽來，總由正陸去聽，不應再在作家的門面上加上重重粉飾，使得習作青年更難受。不是正有人在提倡打倒壓台主義，培植文藝新軍嗎？『一蹴即得』固不可能，但勇氣和決心倒不妨有。這兩樣東西稱之『慾』，也未嘗不可的。連這一點慾也掃蕩去，你叫他們如何創作『優秀卓絕的作品』呀！」

至於修養與磨鍊，那是一切文藝工作者的大路。不但年青的必須，就老的也不能不經常去獲取和充實的。不是很多已經成名的老牌『作家』，也跑到象牙塔或糞溺堆裏去了嗎？」

六月廿二日

文學與革命

文藝與革命

「『革命』這字樣，在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不足怪的，我常想，文學與革命，能取捨就不需要文學及其他種種藝術及宗教，因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吻的嘴不再要唱歌，這理由正是一致的。」

這是周作人在他的「燕知草跋」上面的主張。他自己是實行了的，苦雨，鳥聲，故鄉的野菜，北平的茶食，沖淡下去，是接近于「藝術世界」的了。

其實革命並不如拿竹竿之簡單輕便，也不像接吻。這是周作人的誇張，也是他的胡塗處。革命要改造世界，是的；但同時更重要的是改造這世界上的廣大的羣衆；而且後者比前者還是更具體更久遠的任務。羣衆被舊社會灌施和濡染了落後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革命要把這些意識肅清，創造新的。——所以革命便需要文學，因為它是最有力的改造羣衆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工具。

用「接吻的嘴不再要唱歌」去比喻革命和文學固然可笑，在原則上承認文學和革命有

關，而實際上輕蔑或表示不屑於文藝工作，也是沒有把握到革命的任重致遠的淺薄者。文學沒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然而它要跟革命走盡一段很遙遠的道路。

一九四〇年九月九日

一個例子

針對着現在流行的公式主義而又枯燥無味的文章，所以有人提出寫文章不妨使內容和筆調活潑些，多樣性些。這是必需，也是正當的。

但活潑並不是逞奇鬥巧。爲耍奇，整天絞盡腦汁想新鮮的花樣，結果奇是奇了，但往往因爲植根不深，所以只能給讀者以一個觀感上的刺激，刺激過去後，一無所得，不知者仍然無所知；還有一類文章是連這一種「無條件反射」的效用也沒有的，讀來讀去，使人覺到是打油文。原因自然是太過於浮滑，沒有真需要人了解的東西在裡面。

譬如，對於一位繪畫中國化有成就的畫家，介紹也好，批評也好，自然有許多理由可以羅列，而且也是言之有物，堂堂正正的，但批評者或介紹者却偏有愛就這位畫家的名字發揮的，說名字是出自唐人的名詩，因而其畫也恰如其名，有芬芳而秀麗的風格等等。「玩笑只當牠玩笑」，所以介紹者也就收到反效果了。

寫作上的活潑不是和修養的深厚絕緣的，却剛是與深厚相因，愈是有豐富的貯藏，就愈可以如意地表現，爲銳，爲短，爲讚揚，爲嘲諷，甚而至於爲咒咒，仍可以不失其嚴謹正當的。

十一月五日

韌和避忌

作戰是應該韌的，赤膊上陣大家不贊成。

然而「韌」應是「堅」的繼續，沒有很認真的作戰態度，決心，毅力，勇氣，就根本談不到「韌」。現在文化界的批評風氣是雍塞異常的，究其原因，固然言路的窄，時勢的適應，都有關係，但絕不能說因爲這樣便鴉雀無聲。許多必要而又可能的批評，實在還是急待進行的，不過是，我們的文化人和作家，有些肩了「避免內部磨擦」的招牌，便明哲保身，在工作範圍之內，各人只朝着自己前面的一條其實並不會寬暢，而是自以爲有餘地的道路走，對同路人，採用了着嚴格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方策，因批評而惹到自已站出來說話，那就破壞了這位作家的清名，說不定還因此連累到洗不清的「被嘲」或「被罵」，所以大家還是各走各的好，向別人開口，是不來的。

這種遷延的態度，只源於作家們已被盛名讚譽重重裹住，而不肯承認這是一項與「艱」是沒有絲毫血緣關係的。

如果不想把已經蔓延文壇的名流式的「面子」已打破，批評風氣豈能保持下去。

「通俗民族文藝」兩種

昨天因避警報，到鐵路旁的一間印刷廠的工場去，在那里看到工人自己辦的週報，因與「通俗民族文藝」有關，所以特地一字不易，節錄一段在這里：

一個建議

在物價未有跌落的今天，作工的人鬧着生活困難。有些人說，難行難管或綠豆粥米粉等等，一天收入最少五六元，那不比我們作工的人好得多嗎？也有些人怨恨自己投錯行的，其實這種說法極端不對的，今日抗戰期中，工人的地位重大得很，絕對不應與那小販比較的，不過生活困難了，亦成問題，最好大家站定自己的地位，要利用一些工餘的時間做點生產之事，比方雪花膏，香糊，墨汁等這些化學物品，成本很少，製造簡單，但市面賣出價格倒不少，工人在工餘可以慢慢製造，但也很難辦到的，最好得那些賢能的人出力來領導。

雖然用了一箇「之」字，和一「暨」兩個古典字，但這篇都幾乎就是他們日常的口語，極易懂，也就是「通俗」。在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出，新與工農大眾的語彙是已經擴充和發展了的：「價格」是經濟學上的名詞，「化學物品」是自然科學的用語；至於「領導」，則更屬政治術語了，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的確已把這些語彙吸收並且運用起來。此外如「轉行」，「投錯行」，「亦成問題」等等都是新與羣衆的普通口語，說來自然且確切。

所以「通俗民族文藝」是有兩種的，一種是讀書人替「大眾」作出來的，見於巴夫等的提倡，滿口「却說」「書歸正傳」，不想在已經僵死了的陳調爛套之外創造適切的真正合乎現代需要的通俗，而另一種則是在實際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它不但踢開了不能消化的古朽的骨頭，而且也需要新的適應生長的血液。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

空白页

第

四

輯

張獻奎 李 聞

中國的讀書人一向最善於無弄筆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一字之差，竟劃出了當時兩羣人的社會關係。這兩句話無疑地會替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做了不少鉗口征心的工作，然而「治人」與「治於人」者之間却並不能就此平靜，雖然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下，「治於人」的勞力者也會掀動過若干次的波瀾。

當波瀾一起的時候，讀書人必又多數是站在主子的一面，嚴正地担负起衛道的任務。所謂「言人」，就爭先恐後將「叛逆」渲染成最殘暴最非人的怪物，使之凶跡昭彰，殺頭棄市也是罪有應得。而這樣一來，對方的小白臉就更加堂皇了。

「長毛」恐怖，時間之長竟達六十餘年。清末時用以比喻革命黨人，曾經是嗜炙人口的的事。辛亥以後，才漸漸有些人從推翻清廷這一點上了解了「長毛」，原來他們也是人，並不如曾國藩奏章中所述之可怕。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現在，舊劇裏面侮辱洪楊的「鐵公雞」被禁演了，新劇又有了表揚這些起義者的好幾本。今人如引用「長毛」罵人，則其一定罵不倒，是可以預想而知的。

。以爲這樣，便可以消他盜匪或一個血口而國子。然清廷發給的賞格並可成功。

。謝開明是一派。有明一代算是政治最黑暗的一代，官吏舞弊，民不聊生，流寇迭起，貪穢盈庭，刑獄苛虐，延保的官吏各各，視民如土，崇禎三年十二月，熹宗六年，宣佈了國次增田賦的國令，國管官吏在國賦的國令，農民是在饑饉的國中，才起來做流寇的。這種現象就是國管也不管不救。

「閩黨壽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迭歲大役，流賊一時並起……三邊饑軍，亦羣起爲盜。大吏惡國賊，曰：此饑饉，徐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由陝游民仰驛藉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明鑑）

而「讀明史蠶述」更稱：

「是時秦地所徵曰新餉，曰均輸，曰簡架，其日日增，真因緣爲姦，民大困……蓋民亦化盜也。」

可見流寇之起並不由于他們「生成賊性」，而是有着客觀的根源的。

李自成（即闖王）入河南府時，「明鑑」是這樣記載的：

「賊既殺王（指福王常洵），勺其血，雜糜肉以食。日屠雞酒，火三宮、散金以賑饑民」。

張獻忠陷太湖時的記載如下：

張獻忠陷太湖後稱王，鑄西王之寶……下令開科取士……下令發還賜金，賑饑民，賑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屬。（《明鑑》）

新道史官所記的史書，還不能完全演沒真相。從裏面我們多少可以看到一些流賊的義行勇為。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後半期的爭鬥中小官吏也紛紛領頭造賊。

我們並不想矯枉過正，獎勵亂臣賊子，然而當時的朝廷重臣，的確不比流賊為可恕，如守將洪承疇，祖大樂，吳三桂都先後降清，周延儒自請疏師抗清，得到皇帝的嘉獎，但祇是駐兵通州，不敢戰，終日飲酒，而騰章奏捷，即使幸自成不入北京，崇禎也終於要自縊的了。讀晚明史不責朝廷的政治腐敗而徒罵流賊者，是亦冤哉！

明代的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了一「治於人」者只能掀起落後的散漫的農民暴動。這種鬥爭沒有具體的政綱和正確的領導（連如太平天國的一道檄書也沒有），因而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失敗。人家也就只談到張獻忠們的殺人，至於發獎金，賑饑民，便很少人談，因而也不大為人知了。我想，以此罵人的至少應該知道一點底細，豈是「成王敗寇」這一套說法，力量是薄弱得很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

談黃花節

七八年前，我在廣州唸書的時候，生過一場很厲害的頭昏病，由學校送入一所私人醫院留醫，自晨至暮，靜靜躺着聽那頂樓疏落的鐘聲，非常寂寞。因此就和學校派來伴我的那位宿舍長工搭訕着談起來。他年紀已上五十歲，姓陳，南海人，有着我預想不到健談的興味。其實，我沒有力氣開口，所謂談，幾乎全是這位老人「說書」似的給我講他所目擊的異故事，當時我很驚服他對於廣州的掌故之熟悉，自己則簡直感到興奮，微溫。現在仍未遺忘的有兩件事，一是民國某年，許多亂七八糟的窮措大忽然開脫了好幾副大甲萬，在火光銀影的大快樂中，又忽然風刮過似的，一個個倒了下來；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十九歲的兒子。第二件，便是辛亥年的溫生才刺孚琦。

這次病後，我便正式看一點與革命有關的歷史。說起來實在是受那老長工的指點的。但看了「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等書後，覺得興味遠不如聽那老長工嘴裏講，大概因為書上寫得欠詳細，而且加上文字的隔閡之故。不過看記載却有另一面的好處，老百姓所最認不得記不牢的「上諭」之類，記載里面正有着。

溫生才刺李琦，廣州市民直到現在還引爲壯談，也瀟成電影過。他的行動代表了許多人們的行動，所以後人才追念他，同情他，但在被張眼致處斬，摘心致祭李琦的當時，不僅沒有人撫哭過。當時的革命報紙也只有一點隱約其詞的文章：這並非大衆不同情革命黨人，實在是那時候不容許有同情。那時的革命報紙每一可報，鄒魯先生主編，載了一篇「東門外之今昔觀」，文曰：「溫生才乎，你何愚不可及，乃在此多難發生之地，犧牲一生，作地理歷史上之紀念物，曾左胡李何曾不是英雄，乃必步趙史徐後塵，濺血東門，始爲英雄乎」，意思含糊到好像勸他學會國藩左宗棠，但還逃不過巡警道的鷹眼，勒令停版的論文下來了，其令曰：

夫溫生才不過卑賤之一夫耳……考之於古，則春秋之義，亂賊爲人之所必誅，稽之於今，則暗殺之擾亂治安，不得儕於國事犯之列。……而該報記者爲之憫惻，豈傷心人別有懷抱耶？抑氣類相感，獨表同情乎？……又查本月十六日國聞感言欄內論賣國賊中，有「究其原因，則由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之大清皇帝，先不自愛國，始寧贈朋友不予家奴之言，……」等語，夫此等言論，豈臣人所宜出，……而資黨之口實，其貽禍不可勝言，非僅議論分歧，宗旨不甚純正者比。……核與連日所載溫生才新聞雜著，鼓吹暗殺主義，推波助瀾，無所不至，……

這道於言論機關，權力維持，藉以開通民智，原不忍過事吹求。惟惡毒言之亂政，禁邪說之惑人，決所不容，情非得已，亟宜查照報律，永遠停版……毋違，特諭。

這道上諭，要是讀它湮沒，實在可惜；我特地抄錄下來，給像我一類向來以為官樣文章不過敷衍堆砌而已的人們鑑賞。「可惡」不過惋惜溫生才，或者如「上諭」所說，同情溫生才；清廷的「報律」大概沒有禁止人民同情革命黨的明文，否則「上諭」里不至於不能指出所犯的是幾條幾款；但即使有，那程度必須規定，例如同情到什麼程度就禁止等等，這顯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歷來很多皇帝不看重有形的法律，甚至討厭法律，就是爲此。路易十六頒發過幾千張「加封之函」給貴族們，叫他們殺那些可疑的人民，有「加封之函」，就無須根據法律，也無須審判；清廷巡警道則用精密的嗅覺嗅出「氣類相感」來，都是對付「口不言而心非之」的庶人的方法。

溫生財刺李琦後，接着是三二九的舉義。官方的有形損失很微，革命黨人的遇難，則極慘烈；有的在戰鬥中死去，有的被捕後就義，當審訊時，追問計劃，盤究黨羽，到喻培倫烈士時，他說：「學術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所以章太炎先生在喻培倫傳中說：「以氣矜懣清吏，……功雖不成，然自武昌兵起，清吏所在奉頭駢駢者，其氣奪也。」

我國從古以來，常有為民請命，捨生求法的人，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代表着堅毅不拔，臨難不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時代前驅者的美德的崇高典範。一羣白面書生，做這無目的舉動，小商人，不知不識的工人，農民，教徒，赤手空拳，憑籍着處於清政府殘暴壓之下的薄弱的革命組織，刺殺守舊，攻陷督府，從事於知其必敗的舉動，這不但是毫無意義的行動是什麼？

但不該革命的人，竟談革命更而無知無識談頌的人，是決不會知道歷史的真實，也不了解革命的艱險的。自己為紀念而紀念，以為先烈們也是為烈士而烈士了，因此紀念流於公式，其損失實在等於湮沒這一頁革命血史。國父在「黃花崗烈士墓略序」上鄭重指出，「徒感愴於其餘事，斯誠後死者之痛也」，就是最遠見的告誡。

清政府的昏庸，暴虐，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壓迫國內異民族，何嘗不是耳所共聞，目所共見？但「殺之權」操之暴虐者手中，要談革命，非輕生死外功名的真正志士不能耳。古語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又說「殺身成仁」，但真要做到，就不容易。趨炎附勢，利祿薰心到這不必說，平日高談革命的人，也多要看風色，轉灣兒，這叫做明大體，順天時。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後來就產生了一批暴戾恣睢的國民軍，在舉槍殘殺工人之前，悄悄地把自己所藏的傳立憲的書籍焚去，以思想純正的公務人員自居

，被殺的便是一團黨了。三二九之役里面的陳鏡波，十一年公開叛變的陳炯明，不正是一類型的東西嗎？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這是躬與其役的黃克強先生的挽聯。爲要達到目的，不惜肝腦塗地，粉骨碎身，這於殉教者和先驅者是一樣的。先烈們的目的，是要民族得到自由，人民得到自由，是反專制，反殘虐，所以他們是四百兆人的楷模，也是四百兆人的靈魂。黃花崗的血痕已經淡了，但它留下來的，活的教訓。

一九四一，三月。

火

一八七一年五月，在反動的普魯士軍隊協助之下，法國政府將巴黎的一切隘口都封鎖了，梯亥爾總理於是對城內的巴黎工人大聲叫喊：「我將是無情的，贖罪需要高價，審判需要嚴厲！」其他的政府要員則大喊「放火」！並輕輕地告訴他們的奴僕（一直到窮鄉僻壤）以這類的口號：「搜殺我們一切敵人，把他們當作簡單的放火者」。

於是血腥底狂飈跟着反動的梯亥爾們所放底烈焰在巴黎開始了。政府核准海軍去「格殺、焚毀、破壞」工人們佔據的巴黎，普魯士軍隊和梯亥爾軍隊混在一起，屠殺當時公社底成員，非戰鬥員以及他們的女人孩子。凡曾是梯亥爾及其隨從（地主，教父，貴族）們政治的或私人的仇敵，都被告密而加以殺戮，被火焚的，刀刺的，砲轟的，以及凡爾賽歸來的軍官太太們用以作樂而射殺的工人及其婦孺底屍體和血淤，積滿了巴黎的大街橋巷，爲了澈底剿毀他們敵人這「巢穴」，巴黎市長維脫秀早就預備好了幾十桶洋油，交給入城的海軍及軍士們作「放火」的燃料。

由於良心上的躊躇，不向敵人進攻而遭受慘屠的公社工人們，在巴黎堡壘之前無效

軍頭又光榮地作了英勇的抵抗。——所以無效，是因為公社預早放棄了對敵人的進攻，現在已經無法大軍共同包圍了。——公社知道，它的敵人是毫不顧惜巴黎人民的生命。而他們（工人們）就準備着如果殺進到了極端，將在廢墟之下埋葬掉自己。當入城者所放的凶焰更其殘酷的片刻，工人們於是便火延燒了城內房屋及公共紀念碑。這被壓迫者反抗的火，和他們的血液一道沸騰，焚燒起來了。

是的，工人們所放的火是無補於這次鬥爭的。財富享受者們——梯亥爾以及他底隨從們雖然爲着失去華麗的教堂和住宅而咆哮，但咆哮之餘，又是帶着猙獰的臉孔，再無以倫匹的卑視的態度向城內的人們訕笑：「你們終于失敗了，巴黎的秩序又再由我們安撫了，神父，貴族，淫蕩女人——一切你們趕出巴黎的，都回來了。我們是無情的，我們的火勝利了！」

對於失敗，公社底戰鬥者們真的要後悔他們對壞人太過寬容，然而對於訕笑，他們却以無聲底肅穆來作回答。他們莊嚴地而又光榮地躺在壓迫者底烈火之下，到現在是七十年了。

梯核爾羅摩勞們認爲，他們用以鎮壓反對者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合法的」。

但當被壓迫者用同樣的手段來反對他們的時候，他們又把這些行動看成犯罪的了。七十年以後的今日的歐洲，壓迫者所放的火不特沒有息滅，而且正在「合理的」和「合法的」這些美觀底裝飾（也是一種特權）之下，進行更瘋狂的放火行動。這些第雷諾政府爲着要替法而化的反民主的道路作殫精竭慮的工作，正在提起一八七一年五月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暴風和國內恐怖。人民的報紙被禁止了，罪名是「不合法」。在勃倫們底努力協助之下，「肅清運動」是更其開展了，爲要順利地進行「肅清」工作，法國政府對工廠工人還準備「放鬆各種的限制」，以便博取一部分工人的歡心。資本家雇主集團也提倡了「新運動」，「其目的在使雇主與工人間達到一種非政治性質的諒解。」而達拉第對這問題「極感興趣」。（均見漢宮欽著戰爭中法國的內幕，文摘六十四期）。資本家與他們所雇傭的領袖們正在用「改良」的招牌去騙誘法蘭西工人。然而釣餌愈香，殺機也就愈深，這一切，都只暗示着在法國已經準備着一把滔天巨焰，而在沒有燃起之前，首先要剝奪反對者的武器，誘餌離間被剝削者羣吧了。

歷史是不會簡單地重演的，事實也證明如此。一八七一年被壓迫者們所有的只是一個在敵人圍困中的危城，而七十年後的今天，堅強的社會主義堡壘已在另外一個國家建立起來了。然而又惟其如此，梯亥爾維脫秀們在今天不只把火焰對準國內的被壓迫者羣

，這同樣是強着社會主義的土地。他們的敵人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放火者，而是燒殺不盡的倔強的千百萬隊伍了。

被壓迫者將接受歷史上最殘酷的教訓，爲着他們底前途，而給予放火者以堅強的反擊。這是無疑的。而由於放火者握有着一切「合法的」特權，威脅利誘並用，則被壓迫者底奮鬥過程，又無疑地是長期而艱苦的。而且將很殘酷。這種前途不但存在於法國，還存在於遠東及西歐的一切國家。

一九四〇，四，九日

末世紀的悲哀

——弔張伯倫先生

張伯倫先生逝世了，半年之前還顯赫一時，代表一種主張而震動了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張伯倫先生，九日晚在私寓溘然長逝了。讀路透社的消息，僅十六字，語焉不詳；逝世之前一日，也僅由張夫人送致路透社一則關於病篤的簡電。歐洲人士甚至英國人士，對於一位最近還縱橫捭闔的人物出以這樣冷漠的態度，實在是極值得深思的事情。

原因之一，也許是他不死在不干涉政策縊死西班牙人民陣綫的時候，不死在羅馬徽恙歸來，綏靖政策正為萬目所睽的時候，相反，他的死恰好在戰爭凌遲了歐洲，妥協外交失了光芒的現在，即使奉現實主義為圭臬的人們，也失去至哀的弔悼。但主要的一面，完全的一面，却實在由於歷史的殘酷。張伯倫最為人所不及之處，是他那圓滑老到的外交手段和不易怒，能涵量的政治家風度。所以他成為頑固派的主張底最堅持的代表人物；形成劃時代的一種外交風格和政策；甚而至於曾博得英法熱中于民主的人士寄以若干的幻想。然而他的長處，並不使他完成他自己標榜的「使歐洲從戰爭的威脅與恐懼中

拯救出來」的宏願，只使他達到了歷見反動的登峰造極的境界。是的，他能夠不感到在服波蘭之後，在國會裏要求大家必須假意是在蘭征服了德國，然而正如前節的。對於一年前所說的，「辯護士的責任不在發自己的牢騷，而在得取審判的同情，這政府」應當便是全部歐洲，一部份亞洲，和美國。」

如果今日的西班牙人民不得不在弗朗哥的道害下打熬着，如果今日以大利、希臘的全部，波蘭的一部人民不得不在呻吟於希特勒的鉄蹄，甚至至於今日的希臘人民不置不單獨走向對抗意大利，那這一切良民們都應該記起他們所得到的保證，不會忘記這和平陣綫的不干涉主義者和綏靖主義者底德行。

如果今日的大部分法國人民不得不過着付價戰費的生活，今日的不列顛兵士不得不在海峽以至非洲喪失他們的生命，他們最好能夠記起來，在戰爭之前還有着和平的機會，即使不能不戰爭，也還有人民自己主宰這戰爭的機會。有人說，希特拉創造了戰爭，張伯倫遏止着戰爭；而戰爭之最終要爆發，或者張伯倫的最終要承認戰爭的爆發，是「惟其義盡，所以仁至」的表現，是一種苦心孤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美德的表現。我不想爭辯希特拉的放火比張伯倫的容忍放火爲更值得原諒，我只想剖明張伯倫爲什麼不能不容忍放火甚至是事實上的放火者的苦心，這種苦心究竟有多少權利要求世界正直人

士也斥希特勒主義而由重生自己。

張伯倫沒有懸崖勒馬，是衆所週知的事情。然而這並非他沒有懸崖勒馬的機會，他原有着足夠的時間和諫責使他改變他的政策的：

「要是沒有蘇聯的援助就去援助波蘭，等於自投羅網……我要求政府採取緊急的步驟去獲取蘇聯的同意，同盟，協定，公約——不管它稱作甚麼，祇要它是一種共同對付侵略者的諒解。若辦不到這點，我們便承擔了一個可怕的賭局，一個極危險的賭局。」（勞合喬治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在下院的演講）

「他（張伯倫）對着德國的巨大軍力去保證波蘭，羅馬尼亞和希臘。我是第一個在下院喚起大家注意這件事的，我會斥責這個沒有俄國的軍事援助而允許的保證——爲絕頂的瘋狂……」（勞合喬治，一九三九，七月廿七日發表于「星期快報」）

甚至於他同黨的邱吉爾也在一九三九，五月四日的「每日電聞」提出了警告：

「除了俄國的實力援助，再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在東歐支持一個反納粹侵略的戰線。」

張伯倫沒有在這些諫責和警告之前稍爲動搖其成見。他在下院答工黨議員：「我們不能只注意和蘇聯的關係，還有其他國家（特別指德國）和我們的關係也同樣重要。」

謂氣之間，承認德國的「生存空間」是合理的要求。所以這就不是一個及魯德維希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係一時代一階層的根本問題了。

張伯倫所處的時代，是大英帝國資本主義已經停止了前進，世界資本主義開始動搖和衰退的時代。而在另一方面，又正是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立了堅固的基礎，世界文化走到一個轉捩點的時代。資本主義末世紀的文化政治鬥士們最急要的任务，是如何把普遍了世界的新文化運動和真正的革命運動抑止，凡爾賽條約的真正精神不在於壓抑德國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恢復，而在於憎恨真正的德國人民革命。同樣，許多新的小國的建立不完全由於民族的自決，而是協約列強得意地造成的防止社會主義革命蔓延的築堤。德國人民力求在一九一八—二三年完成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摧毀軍閥官僚階級，打倒普魯士貴族大地主的權力和佔有，由此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基礎用以代替魏瑪的假民主，然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隱蔽之下，這革命終於在血腥中被殺。英法協約列強通過社會民主黨指使德國的反革命，軍國主義終於重新在德國建立起來了，成爲未來法西斯團體的細胞的黑衛軍，也在協約列強的默許和監督之下建立起來。

這是當時英法協約列強的「選擇」。因爲德意志的革命成功，社會主義在歐洲就可避免地要取得勝利。與其如此，他們寧願扶持和容忍聲名狼籍的軍人和反動勢力。張

伯倫走著同樣的「選擇」的道路。這就是他全部的苦心，他每一着棋子的煞費躊躇處。他在這一「選擇」的目標之前不動搖，不餒志，直至他一生的終結。

像這樣一位忠貞堅韌的鬥士之死，而竟引致世界如此冷淡的漠視，這事實，不能不使我們爲他所忠實的時代而悲哀，這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慰藉的真正的悲哀。

而在這時代沒有結尾之前，綏靖政策當然不會和張伯倫一同腐朽，然而將只能在世界上留下黯淡的印象，已是預卜的了。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掩飾與自供

英工黨議員普列特在所著「第二次大戰中蘇聯的外交」一書中，無情地暴露了大英帝國整個官紳階層的昏昧和無能，專橫與惡化。伯納蕭，杜德以至於普列特，可說是紳士們所深惡痛絕而又不易拔除的眼中釘，——帝國內也竟有這些敢于替人民說話的「叛徒」們了。

因為自己是國會議員，所以普列特知道許多關於紳士們的內部的隱傷和啼笑皆非的「幽默」。更不幸的是，他竟將這些材料公開，使那些作為英法「下等人」的人們也從此知道了。這對於張伯倫先生們是不很體面的。普列特列舉的不列顛底幽默有如下的「節」：

一九三九年五月至八月，是德國的毒爪已伸延到波蘭，英法蘇談判臨到緊張而決定的階段的時候，英國國會也會經開了幾次會。（似乎還是例會）。因為政府遲遲未答覆蘇方提出的關於締結英法蘇公約的緊急要求，國會的輿論有些鼎沸了，大多要求首相有所解釋。然而張伯倫却是那麼不孚衆望地說：「我們不能只注意和蘇聯的關係，還有其

他的國家與我們的關係也同樣重要」。接着是羣情嘩然，首相於是更暗淡了：「我不願再說話了，政府的外交政策諸君是會明白的。」於是議會的風波一平靜」下去，「哈里法克斯一直坐在家裏」，三國談判只派了一些「不列顛紳士們差使的紳士」去「磋商」，停頓了。

但英國人，至少「下等人」對於政府所走的道路，是有些茫然，不會「明白」的。看三月二十日的路透電，哈里法克斯爵士的演詞却是「不傷害英蘇關係」的了：

「吾人主要之目標，乃在擊敗德國，此項目標政府絕不轉移，在任何時間，吾人均不採取傷及英蘇關係的行動，此點希望諸君深信勿疑，予之解釋英國政策，自信已極明白。」

不但由哈里法克斯坐待三國談判決裂的事實已證明「在任何時間」內英國紳士都不會打算聯合蘇聯，而且，在或遠或近的事實表現，諸如斯坎的納維亞的推波助瀾，巴勒斯坦的枕戈待旦，替希特勒造和平條件之層出不窮，為第三帝國轉移侵略鋒芒而策劃再四，倒反使人不能不「深信」大英紳士們「主要之目標」仍在社會主義的土地。然而羣衆非盲，也不完全麻木，他們將會揭穿這些牆幕的。從哈里法克斯這篇「不傷害英蘇關係」的演詞，就可以看出紳士們是怎樣兢兢業業，惶惶掩飾。因為他們知道，非如此，

一下等人——們是不願再爲一場與他們毫無關係的「因獸鬥」而赴死的。

其實並不待羣衆，在同日戰報的哈瓦斯九日電就給哈里法克斯打一個耳光。

下院十九日午後開會時，張伯倫會就芬蘭問題發表聲明，謂芬蘭接受和平條件，良非得已。英雖與芬蘭相隔頗遠，又須顧及本身作戰之需要，但仍積極予以援助，例如英國曾以飛機一百五十二架，大砲二百二十三門，砲彈二九二〇〇枚，其中已有飛機一百零一架，大砲一一四門，砲彈一八五〇〇枚運往該國，或謂英法對芬蘭未曾履行義務，實非確詞。

由英國首相所自供，當然是「確詞」的了。他告訴我們：英法對芬蘭是「積極援助」的，其「履行義務」較張伯倫自己提過保證的波蘭還澈底了千萬倍。然而結果，芬蘭還是接受了和平，而不列顛資助的軍火還有一部份在待運赴援呢。「良非得已」——這裏只有慨嘆了！

伯納蕭說：「他們已不復是一羣有教養有紀律的貴族而對着一堆無教育無紀律的昏蛋了」，看這些擺搖不定的詐欺的言行，正一點也沒有說錯。

一九四〇，三，二十五日。

野草叢書之三

感覺的音響

每册實價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印	經	發	發	著
刷	售	行	行	者
者	處	者	人	者
國	各	文	夏	秦
光	大	獻	雪	似
印	書	出	清	
刷	店	版		
廠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三月初版

文藝生活叢書

轉形

司馬文森作
定價三元

這是司馬文森先生第二個中篇小說，寫的是南戰場某戰區，我們的某一部份抗戰部隊，怎樣從腐蝕的封建式的統治，蛻變而成爲勇猛的抗戰新軍；寫我們在南戰場的軍事，如何從廣州失守，轉變到粵北大捷；如何從退守到反抗，是一部史詩式的作品。作者從抗戰爆發後，即參加該戰區工作，耳聞目見，累積多時始成此書，是他繼「天才的悲劇」後光輝的作品。初稿完成時曾在「國民公論」上連載，雖因「國民公論」停刊而中輟，但已深得廣大讀者之熱烈歡迎矣。

蕭

伍禾作

定價二元

「蕭」爲伍禾先生之千行長詩，寫的是一個革命者艱難苦鬥輝煌的一生，在「文藝生活」發表時，曾深得廣大讀者之歡迎。現經作者細爲修正後，交本社發行單行本，預料此書將爲一九四二年最難得的詩作。

文獻出版社發行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